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韶山毛泽东图书馆
青苹果数据中心
联合出品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　录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旧版）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字版）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战争
第一节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第二节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第三节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第四节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第三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第一节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第二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
第三节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
第四章　“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第五章　战略防御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第二节　反“围剿”的准备
第三节　战略退却
第四节　战略反攻
第五节　反攻开始问题
第六节　集中兵力问题
第七节　运动战
第八节　速决战
第九节　歼灭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同版本封面）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背景资料）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旧版本）

毛澤東：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畧問題

毛澤東著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畧問題

目錄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戰爭……一——一三
一、戰爭規律是發展的……一
二、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戰爭……五
三、戰界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六
四、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九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戰爭……一四——一六
第三章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一七——二二
一、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一七
二、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一八
三、由此產生我們的戰畧戰術……二一

第四章　圍剿與反圍剿……二三——二六
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形式……二三
第五章　戰畧防禦……二七——七〇
一、積極防禦與消極防禦……二七
二、反圍剿的準備……三〇
三、戰畧退却……三二
四、戰畧反攻……四四
五、反攻開始問題……四六
六、集中兵力問題……五五
七、運動戰……六一
八、速決戰……六五
九、殲滅戰……六八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畧問題

毛澤東

這本小書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爲當時紅軍大學的教本而寫的，目的在總結內戰的經驗。只完成五章，尙有戰畧進攻，戰畧轉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許多問題，沒有工夫再寫了。四年來只有油印本，玆應軍政雜誌社之請，用鉛印出版，藉供黨內同志們參考。這是一場大爭論的結果，是表示一個路綫反對另一個路綫的意見。對於目前的抗日戰爭還是有用的。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著者識。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戰爭

一　戰爭規律是發展的

戰爭規律——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革命戰爭規律——這是任何指導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3.中國革命戰爭規律——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環境裏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的戰爭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規律，還要研究更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大家明白，不論做什麽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他的性質，他與以外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戰爭——從有階級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與階級、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之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不懂得他的情形，他的性質，他同以外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戰爭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導戰爭，就不能打勝仗。

革命戰爭——革命的階級戰爭與革命的民族戰爭，在一般的戰爭情形與性質之外，有他特殊的情形與性質，因此在一般的戰爭規律之外，有他的一些特殊的規律，不懂得這些特殊的情形與性質，不懂得他的特殊的規律，就不能指導革命戰爭，就不能在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中國革命戰爭——不論是國內戰爭或民族戰爭，是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之內進行的，比較一般的戰爭，一般的革命戰爭，又有他的特殊情形與特殊性質，因此在一般戰爭與一般革命戰爭的規律之外，又有他的一些特殊的規律，如果不懂得這些，就不能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所以，我們應該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也應該研究一般革命戰爭的規律，最後，我們還應該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有一種意見是不對的，我們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就是說：只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就得了，具體的說，只要照着中國政府或軍事學校頒佈的那些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這些條令僅僅是一般戰爭的規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國的，如果我們一模一樣照抄來用，絲毫也不變更其形式與內容，就一定削足適履，要打敗仗。他們的理由是：過去流過血來的東西，爲什麼要不得？不知道我們應該尊重過去流血的經驗，但還應該尊重自己流血的經驗。

又有一種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就是說：只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就得了，具體的說，只要照着蘇聯內戰的指導規律及其頒佈的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蘇聯的規律與條令，包含着蘇聯內戰與蘇聯紅軍的特殊性，如果我們一模一樣抄了來用，不允許任何變更，也同樣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他們的理由是：蘇聯是革命戰爭，我們也是革命戰爭，而且蘇聯是勝利了，爲什麼還有取捨的餘地？不知道我們應該尊重蘇聯的經驗，而且應該比較歷史上的及別國的東西，還要更加尊重些，因爲他們的是最近代革命戰爭的經驗。但尤其應該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爲的是中國革命與中國紅軍又有許多特殊的情况。

再有一種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就批駁了這種意見了，就是說：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最好的，我們應該學習他，具體的說，學北伐戰爭的長驅直進與奪取大城市。他們不知道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應該學習的，但不能刻板抄用，因

爲我們現時戰爭的情況已經變化了。我們只應該採用北伐戰爭中那些在現時情況下還能適用的東西，我們應該按照現時情況規定我們自己的東西。

由此看來，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與性質的差別。從時間條件來說，戰爭與戰爭指導規律都是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有各個歷史階段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有其特點，不能呆板移用於不同的階段。從戰爭的性質看，革命戰爭與反革命戰爭，革命的階級戰爭與革命的民族戰爭，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互相移用。從地域條件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均有其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有其特點，同樣不能呆板移用。我們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與民族上的戰爭的指導規律，應該着眼其特點，與着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中的機械論。

還不止此。一個人指揮戰爭，小兵團的指揮與大兵團的指揮是不相同的，起初會指揮小兵團，後來又會指揮大兵團，這對於他是進步了發展了。一個地方與許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會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戰，後來在許多地方也會作戰，這對於他又是進步了發展了。因敵我雙方技術、組織、戰術、戰略的發展，一個戰爭中各階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級階段會指揮的，到了高級階段也會指揮，這對於他更是進步與發展了。停頓於某一一定兵團、一定地方、一定階段，這叫做沒有進步與沒有發展。有一種人，抱着一技之長與一孔之見，再也沒有進步，這對革命雖則在一地一時有些作用，但沒有大的作用，我們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戰爭指導者。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

二　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戰爭

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終久要把他消滅的，而且就在最近的將來會要把他消滅的。但是消滅他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歷史上的戰爭，只有革命與反革命的兩類，我們是擁護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的。神聖的戰爭，僅僅屬於革命戰爭一方面，我們是擁護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與神聖的階級革命戰爭的。人類的生活是由三個大時代組成——人類和平生活時代，人類戰爭生活時代，與再一個人類和平生活時代。我們現在是處在第二個與第三個時代的交點，人類戰爭生活時代將要由我們之手而結束，我們所做的戰爭，毫無疑義的是最後一次戰爭。我們的戰爭是最後的一次，但毫無疑義又是最大的與最殘酷的一次。最大與最殘酷的反革命戰爭，迫臨在我們的頭上，我們如果不打起革命戰爭的旗幟，人類的大多數就要遭到毀滅。人類革命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人類的旗幟，中國革命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中國的旗幟。人類大多數與中國大多數舉行的戰爭，毫無疑義的是神聖戰爭，是正義戰，是拯救人類拯救中國出於毀滅的至高無上的榮譽的事業，是把全歷史轉到新時代的橋樑，是把全地球翻成新世界的燈塔。我們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出發於我們消滅一切戰爭的志願。

三 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

世界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國是戰爭的一全局，一獨立的游擊區，一獨立的蘇區，或一大獨立的作戰方面，也是戰爭的一全局，凡屬帶有要照顧各方面與各階段的性質的，都是戰爭的全局。

研究帶全局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畧學的任務。研究帶局部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役學與戰術學的任務。

向着戰役指揮員及戰術指揮員要求了解某種程度的戰畧上的規律，何以成爲必要呢？在於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在於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於全局性的東西。說戰畧勝利決定於戰術勝利的這種意見，我們曾經給他批駁了。因爲這種意見沒有看見戰爭的勝敗，主要與首先的問題，在對於全局與各階段之關照得好或關照得不好來決定。如果全局與各階段的關照有了重要的缺點或錯誤，那個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說「一着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卽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着，而不是某種帶局部性的卽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着。下棋如此，戰爭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東西，不能脫離局部性而獨立，全局是由他的一切局部構成的，某些局部破壞了或失敗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響，就因爲這些局部不是對於全局有決定意義的東西。戰爭中某些戰術上或戰役上的失敗或不成功，常常不至於引起戰爭全局變壞，就是因爲這些失敗不是有决定意義的東西。但若組成戰爭全局的多數戰役失敗了，

或有決定意義的某一二個戰役失敗了，全局就立即起變化。這裏說的多數戰役與某一二個戰役，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戰爭歷史中有在連戰皆捷之後吃了一個敗仗以至全功盡棄的，有在吃了許多敗仗之後打了一個勝仗因而開展了新局面的。這裏說的「連戰皆捷」與「許多敗仗」都是局部的，對於全局不起決定作用的東西。這裏說的「一個敗仗」，與「一個勝仗」，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所有這些都在說明全局關照的重要性。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主要的是依據情況，照顧部隊與兵團的組成問題，照顧兩個戰役之間的關係問題，照顧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係問題，照顧我方全部活動與敵方全部活動之間的關係問題，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與最吃力的時節。如果丟了這個去忙一些次要的問題，那就難免要吃虧了。

說到全局與局部的關係，不但戰畧與戰役的關係如此，戰役與戰術的關係也是如此。師的動作與團營動作的關係，連的動作與排班動作的關係，就是實例。任何一級首長，他的注意重心，應放在那些對於他所指揮的全局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或動作上，而不應以其他的問題或動作放在自己注意的第一位。

說重要，說有決定意義，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況去規定，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去規定。作戰時選擇突擊方向與突擊點，要按照當前的敵情地形與自己兵力的情況去規定。在給養豐富的地方注意力放在不要吃得太飽上面，給養不足的地方却在於注意不使餓肚。在白區，可以因為僅僅一個消息的走漏而使爾後的戰鬥失敗。在蘇區，則走漏消息的問題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戰役，高級指揮員有親自參加之必要，其他則無此必要。一個軍事學校，最重要的問題，是選擇校長教員與規定教育方針。一個民衆大

會，主要應注意動員到會與提出口號的恰當。如此等等。總之一個原則，就是注意於那些有關全局的重要關節。

學習戰爭全局的指導規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爲這種全局性的東西，眼睛看不見，只能用心思想得到的，不用心思去想，就不會懂得。但這全局是由局部構成的，有局部經驗的人，有戰役戰術經驗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級的東西。戰畧問題，如所謂照顧敵我之間的關係，照顧各個戰役之間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係，照顧有關全局的(有决定性的)某些部份，照顧全般情況中的特點，照顧前後方之間的關係，顧照消耗與補充，作戰與休息，集中與分散，攻擊與防禦，前進與後退，隱蔽與暴露，主攻方面與助攻方面，突擊方面與箝制方面，集中指揮與分散指揮，持久戰與速决戰，陣地戰與運動戰，本軍與友軍，這些兵種與那些兵種，上級與下級，幹部與兵員，老兵與新兵，高級幹部與下級幹部，老幹部與新幹部，蘇區與白區，老蘇區與新蘇區，中心區與邊區，熱天與冷天，勝仗與敗仗，大兵團與小兵團，正規軍與游擊隊，消滅敵人與爭取群衆，擴大紅軍與鞏固紅軍，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軍事任務與政治任務，過去的任務與現在的任務，現在的任務與將來的任務，那種情況下的任務與這種情況下的任務，固定戰綫與非固定戰綫，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這一歷史階段與那一歷史階段，等等問題的區別與聯系，都是看不見的東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練習純熟，都可以指揮如意的。這就是說，把戰爭或作戰的一切重要與必要的問題，都提到較高的原則性上去解决，這就是研究戰畧問題的任務，也就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性的任務。

四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爲什麼組織紅軍？在於使用他戰勝敵人。爲什麼學習戰爭規律，在於使用這些規律於戰爭。

學習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戰爭的學問拿在講堂上，或在書本中，儘管很多人講得頭頭是道，打起仗來却有勝負之分，戰爭史同我們的生活，都證明了這一點。

那末，關鍵在那裏呢？

我們不能要求事實上的常勝將軍，這是從古以來就沒有的。我們要求在戰爭過程中，一般地打勝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將軍——智勇雙全的將軍。要達到這一點，有一種法子是要學的，這就是學與用的方法，學的時候使用這種方法，用的時候也使用這種方法。

什麼方法呢？那就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

許多國家頒佈的軍事條令書上，都有『按照情況活用原則』的指示，又都指示了打敗仗時的處置方法。前一種是不要指揮員因死用原則而主觀地犯錯誤，後一種是當着指揮員主觀地犯了錯誤，或客觀情況起了非所預料的與不可抗的變化時，告訴我們怎樣去處置。

爲什麼主觀上會犯錯誤呢？就是戰爭或戰鬥的部署與指揮不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

主觀的指導與客觀的實在情況之間不相融洽，不相符合，不對頭，或者叫做沒有解決主客觀之間的矛盾。人辦一切事情都難免這種情形，有比較會辦與比較不會辦之分罷了。事要求比較會辦，軍事上就要求比較多打勝仗，反面的說，要求比較少打敗仗。這裏的關鍵，就在於把主觀與客觀二者之間好好地融洽起來。

舉戰術的例子來說。攻擊點選在敵人陣地的某一翼，而那裏正是敵人的薄弱部，突擊因而成功，這叫做主觀與客觀相融洽，也就是指揮員的偵察、判斷、與決心，同敵人及其配置的實在情形相融洽。如果攻擊點選在另一翼或中央，結果正碰在敵人的釘子上，就叫做不相融洽。攻擊時機的適當，預備隊使用的不遲不早，以及各種戰鬥處置與戰鬥動作都利於我不利於敵，便是整個戰鬥中主觀指揮與客觀情況通通相融洽。通通相融洽的事，在戰爭或戰鬥中是極其少有的，這是因為戰爭或戰鬥的雙方是集團的武裝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原故，同處置靜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大體上適合情況，即在有決定意義的部份相一致，那就是勝利的基礎了。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與必要的偵察並對各種偵察材料作聯貫起來的思索。這裏是敵方情況的各種表現，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與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對比着看相互的關係，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對於建設每個戰略戰役或戰鬥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過程。粗心大意的軍事家，不去這樣做，把軍事計劃建設在一相情願的基礎之上，這種計劃是空想的，不符合於實際的。魯莽的專憑熱情的軍

事家之所以不免於受敵人的欺騙，受敵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所引誘，受自己部下不負責任的無眞知灼見的建議所鼓動，因而不免於碰壁，就是因爲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任何軍事計劃，是應該建設於必要的偵察與周密的思索敵我情况及其互相關係之上的原故。

認識情况的過程，不但見之於軍事計劃建設之前，而且見之於軍事計劃建設之後。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又是一個過程，一個新的即實行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於實况，發生重新檢查的問題。如果計劃與情况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於新的情况。部份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是有的，全部改變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願改變，只是盲幹，結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說的是一個戰畧行動，或一個戰役與戰鬥行動。經驗多的軍人，假使他是虛心學習的，他摸熟了自己部隊（指揮員、戰鬥員、武器、給養等等及由他們構成的總體）的脾氣，又摸熟了敵人部隊（同樣，指揮員、戰鬥員、武器、給養等等，及其總體）的脾氣，摸熟了一切其他戰爭環境（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等），這樣的軍人指導戰爭或作戰，就比較有把握，比較能打勝仗。這是在長時間戰爭中，認識了敵我雙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動的規律，解决了主觀與客觀的融洽不融洽問題。這一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一種長時間的經驗，要了解與把握整個戰爭的規律是困難的。做一個眞正能幹的高級指揮員，不是僅僅善於在紙上談兵或初出茅廬的脚色能夠辦得到的，必須在戰爭中學習才能辦得到。

一切帶原則性的軍事規律或軍事理論，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關於過去戰爭的總結。

這些過去戰爭留給我們的血的教訓，應該着重地學習他，這是一件事。然而還有一件事，即是從自己經驗中考證這些結論，吸收那些用得着的東西，拒絕那些用不着的東西，創設那些自己所特有的東西。這後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這樣做，我們就不能指導戰爭。

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最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衆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幹，而是幹起來再學習，幹就是學習。從『老百姓』到軍人中間有一個距離，但不是萬里長城，而是可以迅速消滅的，幹革命，幹戰爭，就是消滅這個距離的方法。說學習與使用不容易，是說學的澈底，使用純熟。說老百姓很快可以變成軍人，是說此門並不難入。把二者總合起來，用得着中國一句老話：「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入門既不難，深造也是辦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於學習罷了。

軍事的規律，同其他事物的規律一樣，是客觀實際對於我們頭腦的反映，除了我們的頭腦以外，一切都是客觀實際的東西。因此學習與認識的對象，包括敵我兩方面，這兩方面都應該把他看成研究的對象，只有我們的頭腦（思想）才是研究的主體。有一種人明於知己，暗於知彼，又有一種人明於知彼，暗於知己，都是不能解决戰爭規律的學習與使用的問題的。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書上『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那句話，是包括學習與使用兩個階段的意義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并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

戰爭——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階級與階級、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互相鬥爭的最高形式，一切關於他的規律，都爲了爭取勝利而使用。戰爭的勝負，主要的決定於雙方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僅僅如此，還決定於主觀指導的能力。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之外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條件許可之內爭取戰爭的勝利。軍事家活動的舞台建築在客觀物質條件許可的上面，然而軍事家憑藉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在既定的客觀物質基礎卽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之上，紅軍的指導者，就要發揮他們的威力，提挈全軍，去打倒那些民族的與階級的敵人，改變這個不好的世界。這裏就用得着而且必須用我們主觀指導的能力。我們不許可任何一個紅軍指揮員變爲亂撞亂碰的魯莽家，我們必須提倡每個紅軍指揮員變爲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他們不但有壓倒一切的勇氣，而且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達到彼岸。戰爭指導規律，就是戰爭的游泳術。

以上是我們的方法論。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戰爭

自從一九二五年開始的中國革命戰爭，已經過去了兩個階段，即北伐戰爭階段與蘇維埃戰爭階段；今後則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這三個階段，已經是而且也不能不是被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首領中國共產黨所領導、或參加了這個領導。因爲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敵人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中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帶買辦性與封建性的大資產階級，雖在某種歷史時機可以參加這個革命戰爭，然而由於他們的自私自利性與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不願意也不能，領導中國革命戰爭走上澈底勝利的道路。中國農民羣衆與小資產階級，是願意積極地參加革命戰爭，並願意使戰爭得到澈底勝利的，然而由於他們的小生產性，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份失業羣衆則具備着無政府思想。因此他們是革命戰爭的主力軍，但不能成爲戰爭的正確的領導者。因此，在無產階級政黨已經形成的時代，戰爭的正確的領導責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國共產黨的肩上。在這種時候，任何的革命戰爭如果沒有或違背無產階級共產黨的領導，那個戰爭是一定失敗或不能進入澈底勝利的。因爲半殖民地中國的社會各階層中，只有無產階級及共產黨，才是比較最沒有狹隘性與自私自利性，比較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與最有組織性，而且也最能虛心接受世界先進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經驗用之於自己的事業。因此，只有無產階級與共產黨能够領導農民、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克服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克服失業者羣的破壞性，並且還能够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與不澈底性（如果共產黨的

政策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與戰爭走上勝利之路。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基本的說，是在國際與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影響與政治合作之下進行的。然而當着革命與戰爭的緊急關頭，首先由於大資產階級的叛變，同時也由於革命隊伍中機會主義者的自動放棄領導權，這次革命戰爭就因而失敗了。

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蘇維埃戰爭，是在新的情况之下進行的。戰爭的敵人不但是帝國主義，而且是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聯盟的統治。民族資產階級則做了大資產階級的尾巴。領導戰爭的，惟一的只有共產黨。共產黨的這種的絕對的領導權，是使戰爭堅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條件，沒有共產黨這種絕對的領導，是不能設想戰爭能有這樣的堅持性的。

中國共產黨是英勇堅決的領導了中國的革命戰爭，在十五年的長歲月中，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爲了保護人民的利益，爲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火綫的最前綫。

中國共產黨以自己艱苦奮鬥的經歷，以幾十萬英勇黨員與幾萬英勇幹部的流血犧牲做代價，在全民族幾萬萬人中間起了偉大的教育作用。中國共產黨的這一偉大的歷史成績，使得今天處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有了救亡圖存的前提條件——有了一個爲大多數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長時間內考驗過因此選中了的政治領導者。現在共產黨說的話，比其他任何政黨說的話，都易於爲人民所接受，沒有中國共產黨過去十五年的艱苦奮鬥，挽救新的亡國危險是不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中，除了犯過陳獨秀主義與李立三主義兩個錯誤之外，還犯過了下述的兩個錯誤：其一，是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的左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使得蘇維埃戰爭受到嚴重的損失，產生了五次圍剿不能戰勝反而喪失了蘇區削弱了紅軍的結果。這個錯誤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的遵義會議時糾正過來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發展到破壞了黨與紅軍的紀律，使一部分紅軍遭受嚴重的損失；然而由於中央的正確領導，紅軍中黨員與指戰員的覺悟，終於也把這個錯誤糾正過來了。所有這些錯誤對於我們的黨，我們的革命戰爭，當然是非常不利的，然而我們黨與我們的紅軍，却從這些錯誤鍛鍊得更加堅強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而且繼續領導着轟轟烈烈光榮勝利的革命戰爭，這個戰爭不但是解放中國的旗幟，而且是具備着國際革命的意義的，世界的革命人民都把眼睛望着我們。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上，我們將引導到中國革命的完成，也將給東方及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響。在過去的革命戰爭中證明，我們不但需要馬克斯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綫，而且需要馬克斯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綫。十五年的革命與戰爭，已經鍛鍊出來這樣的政治路綫與軍事路綫了。今後戰爭的新階段上，我們相信將使這樣的路綫根據新的環境，更加發展、充實、與豐富起來，達到戰勝民族敵人之目的。歷史告訴我們，政治的與軍事的路綫，不是自然地平安地產生與發展起來的，而是從鬥爭中產生與發展起來的；一方面同左傾機會主義作鬥爭，另一方面同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不同這些危害革命戰爭的有害傾向作鬥爭，并且澈底的克服他們，正確路綫的建設與革命戰爭的澈底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在這本小冊子中時常提到錯誤方面的意見，就是爲了這個目的。

第三章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

一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不承認、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中國革命戰爭有其特點的人，把紅軍對國民黨軍隊的作戰，看做與一般戰爭相同，或與蘇聯內戰相同，因而採用相同的軍事指導路綫、甚至一切軍事原則，這，在我們的十年戰爭史中已完全證明不對了。

在我們的敵人方面，也曾犯過了類似的錯誤。他們不承認同紅軍作戰須要有不同的戰略戰術，他們倚仗其各方面的優勢，輕視我們，固守其老套戰法，這是四次『圍剿』特別是三次『圍剿』以前的情形，其結果就招致了他們歷次的失敗。首先在國民黨軍隊中提出這個問題的是柳維垣，後來有戴岳，最後是被蔣介石採納了，這就是廬山軍官訓練團及其五次『圍剿』新軍事原則產生的過程。

然而當着敵人改變其軍事原則使之適合於同紅軍作戰的情況之時，我們隊伍中却出現了回到『老套』，回到一般情況，或回到異地異國情況方面去，拒絕了解任何的特殊情況，拒絕紅軍血戰史的經驗，輕視國民黨軍隊，對敵人採用的新原則視若無睹，結果受了歷史的懲罰。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就不能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就不能引導中國革命戰爭走上勝利的途徑。

二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

那末，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呢？

我以爲有四個主要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地大物博的國家，而又經過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

這個特點，指出中國的革命戰爭有發展與勝利的可能性。當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國游擊戰爭發生不久，井岡山的同志們中有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這個疑問的時候，我們就把他指出來了（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會議）。因爲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不答覆中國紅軍能否存在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大會，把這個問題更原則地答覆了，全國蘇維埃運動就有了正確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針。

現在把這個問題分開來看一看：

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微弱的資本主義與嚴重的半封建經濟同時存在，近乎近代式的若干工商業都市與停頓在中世紀式的廣大農村同時存在，幾百萬產業工人與幾萬萬舊制度下的農民同時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軍閥與管理各省的小軍閥同時存在，正規軍與雜牌軍隊同時存在，若干的鐵路航路汽車路與普遍的獨輪車路、只能用脚走的路與用脚還不好走的路同時存在。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的不統一，影響到中國統治集團間的不統一，數國支配的半殖民地國家與一國支配的殖民地國家是有區別的。

中國是一個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迴旋的餘地。

中國是經過了一次大革命的——準備好了紅軍的種子，準備好了紅軍的領導者卽共產黨，又準備好了參加過革命的民衆。

所以我們說，中國是經過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地大物博的國家，這是中國革命戰爭中的第一個特點。從這個特點出發，不但基本地規定了我們政治上的戰畧與戰術，而且也基本地規定了我們軍事上的戰畧與戰術。

第二個特點是敵人的强大。

紅軍的敵人國民黨，他是怎樣一個狀况呢？他是奪取了而且相對地穩定了政權的政黨。他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國家的援助。他已改造了他的軍隊——改造得與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現代國家却大體相同，武器與物質供給比起紅軍來是特別雄厚，而且其數之多超過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超過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常備軍，同紅軍比較起來眞有大壤之別。他控制了全中國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的樞紐或命脈，他是全國性的政權。

這是中國革命戰爭中的第二個特點，中國紅軍是處在這樣强大的敵人面前。從這個特點出發，使紅軍的作戰不能不與一般戰爭，蘇聯內戰，北伐戰爭都有許多的不同。

第三個特點是紅軍的弱小。

中國紅軍是產生於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之後，從游擊隊開始，不但處在中國的反動時期，而且處在世界上反動國家政治上經濟上相對穩定的時期。

蘇維埃政權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權，沒有任何的外間援助。蘇區經濟條件與文化條件同國民黨區域比較是很落後的。其區域開始是非常之小，後來也並不很大。而且蘇區是流動不定的，紅軍沒有眞正鞏固的根據地。

紅軍的數量是少的，紅軍的武器是差的，紅軍的粮食被服等物質供給是非常困難的。

這個特點與前一個特點是相反的對比，影響到紅軍的戰畧戰術，是在這種相反的對比上發生的。

第四個特點是共產黨領導與土地革命。

這個特點是第一個特點的必然結果。由於這個特點，一方面，就使得中國革命戰爭雖處在中國與世界的反動時期，然而紅軍是能够勝利的，因爲他有共產黨的領導與農民的援助。就使得蘇區雖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與龐大的國民黨政權相對立，軍事上給了國民黨的進攻以很大的困難。因爲有農民的援助，就使得紅軍雖小却有强大的戰鬥力，因爲紅軍人員是從土地革命產生爲着自己的利益而戰鬥的，而且指揮員與戰鬥員之間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則與國民黨成了相反的對比。國民黨是反對土地革命的，因此沒有農民的援助，其軍隊雖多，却不能使士兵羣衆及許多小生產者出身的下級幹部自覺地爲國民黨拚命，官兵之間在政治上是分歧的，減少了他們的戰鬥力。

三　由此產生我們的戰略戰術

經過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經濟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强大的敵人，弱小的紅軍，土地革命——這是中國革命戰爭四個主要的特點。從這些特點出發，就規定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路綫及其許多戰畧戰術的原則。從第一個特點與第四個特點出發，就給了中國紅軍以發展與戰勝其敵人的可能性。從第二個特點與第三個特點出發，就給了中國紅軍以不能很快發展與不能很快戰勝其敵人的可能性，即是給了戰畧持久戰的可能性，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就有失敗的可能性。

這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兩方面。這兩方面同時存在着，即是說在順利的條件下又有他的困難條件。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許多規律都從這個根本的規律發生出來。十年戰爭史證明了這個規律的正確性。誰要是睜眼看不見這些特點，看不見從這些特點發生的兩方面根本性質的規律，誰就不能指導中國的革命戰爭，誰就不能使紅軍打勝仗。

很明顯的，正確的規定戰畧方向，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禦時反對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要反對紅軍的游擊主義，却又要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反對戰役的持久戰與戰畧的速決戰，承認戰畧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反對固定的作戰綫和陣地戰，承認非固定的作戰綫和運動戰；反對擊潰戰，承認消滅戰；反對戰畧方向的兩個拳頭主義，承認一個拳頭主義；反對大後方制度，承認小後方制度；反對絕對的集中指揮，

承認相對的集中指揮；反對單純軍事觀點與流寇主義，承認紅軍是蘇維埃的宣傳者與組織者；反對土匪主義，承認嚴肅的政治紀律；反對軍閥主義，承認有限制的民主生活與有威權的軍事紀律；反對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承認正確的幹部政策；反對孤立政策，承認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後，反對把紅軍停頓於舊階段，爭取紅軍發展到新階段。所有這些原則問題，都從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及其根本規律出發而要求正確的解決，或從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及其根本規律出發，而有特別值得注意的意義。我們現在要講的戰畧問題，就是要就中國革命戰爭的十年血戰史的經驗，好好地說明這些問題。

第四章　圍剿與反圍剿

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形式

十年來，從游擊戰爭開始的一天起，任何一個獨立的游擊隊或紅軍的周圍，任何一個蘇維埃根據地的周圍，經常遇到的是敵人的圍剿。敵人把紅軍看作異物，一出現就想把他捕獲，敵人總是跟着紅軍，而且總是把紅軍圍起來。這種形式，過去十年是沒有變化的，如果沒有民族戰爭代替國內戰爭，那末，直到敵人變成弱小者紅軍變成強大者那一天爲止，這種形式也不會變化的。

紅軍的活動，是採取了反圍剿的形式。所謂勝利，主要的是說反圍剿的勝利，這就是戰略與戰役的勝利。反對一次圍剿是一個戰役，常常由大小數個以至數十個戰鬥組織而成，在一次圍剿沒有基本的被打破以前，卽使得到了許多戰鬥的勝利，還不能說戰略上或整個戰役上已經勝利了。十年的紅軍戰爭史，就是一部反圍剿史。

敵人的圍剿與紅軍的反圍剿，互相採用進攻與防禦這兩種戰鬥形式，這是同古今中外的戰爭沒有兩樣的。然而中國內戰的特點，則在二者長期的反復。在一次圍剿中，敵人以進攻反對紅軍的防禦，紅軍以防禦反對敵人的進攻，這是反圍剿戰役的第一個階段。敵人以防禦反對紅軍的進攻，紅軍以進攻反對敵人的防禦，這是反圍剿戰役的第二個階段。任何的圍剿，都是包括這兩個階段的，而且是長期反復的。

說長期反復，是說戰爭及戰鬥形式的反復，這是事實，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圍剿反圍剿是戰爭形式的反復。敵以進攻對我防禦，我以防禦對敵進攻的第一階段，與敵以防禦對我進攻，我以進攻對敵防禦的第二階段，是每一個圍剿中戰鬥形式的反復。

至於戰爭與戰鬥的內容，則不是簡單反復的，而是每次不同的，這也是事實，任何人一看就知的。

這裏的規則，是圍剿反圍剿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情況一次比一次複雜，戰鬥一次比一次激烈。

然而不是沒有起落的，五次圍剿之後，因爲紅軍相對地削弱了，根據地的位置移到了西北，也不是處在威脅中國主要敵人的最重要地位了，圍剿的規模、情況與戰鬥，就比較小些，簡單些，緩和些了。

紅軍的失敗是什麼呢？在戰畧上說，只有反圍剿根本沒有成功，才叫做失敗，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與暫時的失敗。因爲國內戰爭根本的失敗，就是整個紅軍的覆滅，然而這樣的事實在我們是沒有的。蘇區的喪失與紅軍的轉移，這是暫時與局部的失敗，這種事實，我們把他叫做防禦的繼續。而把敵人的追擊叫做進攻的繼續。這就是說，在圍剿與反圍剿的鬥爭中，我們沒有由防禦轉到進攻，反被敵人的進攻打破了我們的防禦，我們的防禦就變成了退却，敵人的進攻就變成了追擊。然而等到紅軍到達一個新地區時，圍剿反復又出現了。所以我們說，紅軍的戰畧退却（長征）是紅軍戰畧防禦的繼續，敵人的戰畧追擊是敵人進攻的繼續。

中國國內戰爭同任何古今中外的戰爭一樣，基本的戰鬥形式只有攻防兩種，中國內

戰的特點，是圍剿反圍剿的長期反復，與攻防兩種的長期反復，並且包括着偉大的戰略轉移這一種東西在裏面。

所謂敵人的失敗，也是如此。他們的戰略失敗，就是他們的圍剿被我們打破，我們的防禦變成了進攻，敵人轉到防禦地位，必須重新組織才有再一次的圍剿。敵人沒有如同我們所謂戰略轉移（長征）的那種情形，乃因他們是全國性的統治者，他們比我們特別強大的原故。然而部份的事情是有過的，若干蘇區中的白色據點內被紅軍圍攻的敵人突圍而出，退却到白區裏去重新組織進攻，是發生過的。如果內戰延長，紅軍勝利的範圍更廣大時，這種事情會多起來。但他們的結果不能同紅軍相比，因爲他們沒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間又不一致，他們如果也學紅軍的長途轉移，那是難保不被消滅的。

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國內戰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國內戰發展中圍剿又圍剿、打破又打破的這種長期反復的規律（那時已有井岡山的三次圍剿，福建兩次圍剿等），命令紅軍去打武漢，命令全國暴動，企圖革命迅速勝利，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一九三二年的左傾機會主義，也不相信圍剿反復這一規律。在鄂豫皖則有「偏師」說，承認三次圍剿失敗後的國民黨不過是偏師了，要進攻紅軍，就是帝國主義親身担當主力軍。在這個估計之下的戰略方針，就是紅軍打武漢。這和中央蘇區的號召紅軍打南昌，反對蘇區聯成一片的工作，反對「東北路綫」，反對誘敵深入的作戰，把一省勝利放在奪取省城與中心城市的基點上，以及認五次圍剿是蘇維埃道路與國民黨道路的決戰等等，是原則上一致的。這個左傾機會主義，種下了鄂豫皖反對四次的圍剿，中央蘇區反對五次圍剿鬥爭中錯誤路綫的根苗，在敵人嚴重的圍剿面前不得不處於無能的地位，

給了中國蘇維埃運動以很大的損失。

跟否認圍剿反復的左傾主義直接聯系，而說紅軍根本不應該採取防禦手段的一種意見，也是完全不正確的。

革命與革命戰爭是進攻的——這是正確的說法。革命與革命戰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沒有政權到奪取政權，從沒有紅軍到創造紅軍，從沒有蘇區到創造蘇區，是一天也不能保守的，保守主義的傾向是應該反對的。

革命與革命戰爭是進攻的，但也是有防禦與後退的——這更是正確的說法。為了進攻的防禦，為了前進的後退，為了向正面而向側面，為了走直路而走彎路，是任何事物的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何況軍事運動？

但前一論斷，在政治上說來，是對的，移到軍事上就不對了。從政治上某一種情況說來（革命前進時）是對的，假如移到另一種情況（革命退却時，全部退却例如俄國一九〇六年，中國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國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條約時）也就不對了。只有後一論斷，才是全部正確的眞理。一九三二年的左傾機會主義，機械地反對軍事的防禦手段，僅是一種非常幼稚的思想。

圍剿反復的形式何時結束？照我的意見，如果內戰延長的話，那是在敵我強弱對比起了根本變化之時。如果蘇維埃紅軍一旦改變到比自己敵人更為強大時，那末，這個反復就結束了。那時是我們圍剿敵人，敵人則企圖反圍剿，但政治軍事的條件將不允許敵人採取如同紅軍一樣的反圍剿的地位，那時，圍剿反復這樣形式，即使不說完全結束，但一般的結束是可以斷言的。

第五章　戰略防禦

這個題目中，我想說明下列各問題：（一）積極防禦與消極防禦；（二）反圍剿的準備；（三）戰略退却；（四）戰略反攻；（五）反攻開始問題；（六）集中兵力問題；（七）運動戰；（八）速决戰；（九）殲滅戰。

一　積極防禦與消極防禦

爲什麼從防禦說起呢？中國第一次民族統一戰綫失敗後，革命進到了深刻的階級戰爭，敵人是大政權，我們是小部隊，因此我們一開始就是和敵人的圍剿奮鬥，我們的進攻是密切聯系於打破圍剿，我們發展的命運全看我們能不能打破圍剿。打破圍剿的過程往往是迂迴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首先而且嚴重的問題，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機破敵，所以戰略防禦問題成爲紅軍作戰中最複雜最重要的問題。

在我們的十年中，對於戰略防禦問題，常常發生兩種偏向，一種是輕視敵人，又一種是爲敵人所嚇倒。

由於輕視敵人而來的結果，我們看見許多游擊隊的失敗，紅軍若干次圍剿之不能打破。

游擊隊初起，領導者對於敵我形勢看得不正確，看見自己在一地方用突然的暴動勝利了，或從白軍中譁變出來了，一時的順利環境，或對嚴重環境看不到，往往輕視敵

人。另一方面，對自己的弱點（沒有經驗，力量弱小等），也不了解。因而把行動引向錯誤的道路，精神上解除了防禦的武器，許多游擊隊因此失敗了。

紅軍因為這種原因不能打破圍剿的例子，則有一九二八年海陸豐的紅軍，因為輕敵而招來了失敗。有一九三二年鄂豫皖的紅軍，在所謂國民黨偏師說之下，使得反對四次圍剿喪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

為敵人嚇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從與前者相反的立場發出，太看重了敵人，太看輕了自己，因而採取了非必要的退讓政策，精神上同樣解除了防禦的武器，結果或使游擊隊失敗，或使紅軍的某些戰役失敗，或使蘇區歸於喪失。

關於喪失蘇區最顯著者，是五次圍剿中的中央蘇區，這裏的錯誤是從右傾的觀點產生的。然而這種錯誤，往往有一種左傾輕敵的錯誤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進攻中心城市的軍事冒險主義，不能不是後來五次圍剿中消極防禦路綫的根源。

為敵人嚇倒極端的例子，是退却主義的「張國燾路線」，西路軍在河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綫的最後的破產。

積極防禦，又叫攻勢防禦，又叫決戰防禦。消極防禦，又叫專守防禦，又叫單純防禦。消極防禦實際上是假防禦，只有積極防禦才是真防禦，才是為了反攻與進攻的防禦。據我知道的，任何一本有價值的軍事書，任何一個比較聰明的軍事家，而且無論古今與中外，無論戰略與戰術，沒有不反對消極防禦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極防禦當法寶。然而世上偏有這樣的事，這是戰爭史中一

種過失，是保守主義在軍事上的表現，我們是應該根本反對的。

後起而且發展很快的帝國主義國家，以德日兩國爲代表的軍事家中，積極鼓吹戰畧進攻的利益，反對戰畧防禦，這個原則，是根本不合於中國蘇維埃戰爭的，也不合於中國的民族戰爭。他們指出防禦的一個重要弱點是不能振奮人心，反使人心動搖，這是說的階級矛盾劇烈，而戰爭的利益僅僅屬於統治階層乃至當權政派的那種國家，對於我們的蘇維埃戰爭與民族戰爭，則是根本相反的。在保衛蘇區與保衛中國的口號下，能够團結最大多數人民萬衆一心的作戰，因爲我們是被壓迫與被侵畧者。蘇聯內戰也是在防禦形式之下戰勝敵人的，他們不但在帝國主義各國組織白黨進攻時，戰爭的進行是在保衛蘇維埃的口號下，就是在十月暴動的準備時期，也是在保衛首都的口號下進行軍事動員的。一切戰畧的防禦戰，不但有麻痺政治上異己份子的作用，主要的是能够動員落後的人民羣衆加入戰爭中來。

馬克斯說的暴動之後一刻也不應該停止進攻，這是說的乘敵不備而突然暴動起來的羣衆，應該不讓統治者有保守政權或恢復政權的機會，趁此一瞬間把國內統治勢力消滅個徹底，這是完全正確的。然而不是說，雙方已在軍事對抗中，而且敵人是優勢者，當受敵人壓迫時，不應該採取防禦手段。如果這樣想，那就是第一號的傻子。

我們過去的戰爭，整個的是向國民黨進攻，然而在軍事上採取了打破圍剿的形式。

在軍事上說來，我們是防禦與進攻的反復應用。對於我們，說進攻是在防禦之後，或說進攻是在防禦之前都是可以的，因爲關鍵在於圍剿之打破。圍剿沒有打破以前是防禦，圍剿一經打破就開始了進攻，僅僅是一件事情的兩個階段，而一次圍剿與又一次

圍剿是啣接着的。這兩個階段中，最複雜最重要的階段，是防禦的階段，包含着怎樣打破圍剿的許多問題。基本的原則是承認積極防禦，反對消極防禦。

從國內戰爭說，假如紅軍的力量超過了敵人時，那末一般的就用不着戰畧防禦了，那時的方針基本的只是戰畧的進攻，這種改變完全依靠於總的敵我力量的變動。防禦到了那時，剩下的只是局部的防禦。總的方針就沒有與戰畧進攻平行、甚至佔着比較重要的地位、如同現在一樣的戰畧防禦、這種東西了。

二　反圍剿的準備

對於敵人的一次有計劃的圍剿，如果我們沒有充分的與必要的準備，必然陷入被動地位，臨時倉卒應戰，勝利的把握是沒有的。因此在與敵人準備圍剿同時，進行我們反圍剿準備，實有完全的必要，反對準備的意見是幼稚可笑的。

這裡有一個困難問題，也就容易發生爭論。就是，何時結束自己的進攻、轉入反圍剿的準備階段呢？因為此時自己是處在勝利的進攻中，敵人處在防禦地位，敵人的圍剿準備是在秘密地進行的，難於知道他們將在何時開始進攻。我們準備反圍剿的工作開始早了，不免減少進攻的利益，而且有時會給予紅軍與蘇維埃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響。因為準備階段中的主要步驟，就是軍事上的準備退却，政治上的動員。有時會因過早準備，變為等待敵人，等了好久而敵人未來，不得不重新發動自己的進攻。有時或因我們的重新進攻剛在開始，又恰好遇到敵人進攻的開始，把自己處在困難地位。所以開始準備

時機的選擇，成為一個重要問題。斷定這種時機，要從敵我雙方情況及二者間的關係着眼。敵人的情況，須從敵人方面的政治軍事財政及社會輿論等各方面搜集材料。分析這些材料的時候，要足夠的估計敵人的整個力量，不可誇大敵人過去失敗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估計到敵人營壘間的矛盾，財政的困難，過去失敗的影響等等。自己方面，不可誇大過去勝利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足夠的估計到過去勝利及於敵人的影響。

但開始準備的時機問題，一般說來，與其失之過遲，不如失之過早，因為後者的損失較之前者為小，而其利益，則在有備無患，根本上立於不敗之地。

準備階段中主要的問題，是紅軍的準備退却，政治動員，擴大紅軍，財政糧食，政治異己份子的處置等。

所謂紅軍準備退却，就是說不要使紅軍向着不利於退却的方向，不要進攻得太遠了，不要使紅軍過於疲勞。這是敵人大舉進攻的前夜主力紅軍的必要處置。這時候紅軍的注意力，主要的要放在創造戰場，徵集資材，擴大自己與訓練自己的計劃上。

政治動員是反圍剿鬥爭中第一個重要問題。這即是說，明確、堅決而充分的告訴紅軍人員與蘇區人民：關於敵人進攻的必然性與迫切性，敵人進攻與危害蘇維埃與人民的嚴重性，同時，敵人的弱點，紅軍與蘇區的優良條件，我們一定要勝利的志願，我們工作的方向等，號召紅軍與人民全體為反對圍剿保衛蘇區而鬥爭。除開軍事秘密之外，政治動員是必須公開的，而且力求普及於每一個可能擁護蘇維埃利益的人員。重要的關節是動員幹部。

擴大紅軍須從兩方面出發：一方面顧到蘇區人民的政治覺悟程度及人口情況。又一

方面顧到當時紅軍的情况及整個反圍剿戰役中紅軍消耗的可能限度。

財政糧食問題，不待說對於反對圍剿是有決定意義的，要顧及圍剿時間的可能延長。主要的是紅軍，再則蘇區的人民，在整個反圍剿鬥爭中物質需要的最低限度。

對待政治異己份子，不可對他們不警戒。但也不可過於恐懼他們的叛變，而採取過分警戒手段。對地主、商人、富農之間是應該有分別的，主要的是政治上向他們說明，爭取他們的中立，民衆監視他們。只有極少數最帶危險性的份子，才可以採用嚴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圍剿鬥爭勝利的程度，是與準備階段中任務完成的程度，密切聯系的，由輕敵而發生的對於準備的放鬆，與由嚇倒於敵人進攻而發生的驚惶失措，都是應該堅決反對的不良傾向。我們需要的是熱烈而鎭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

三　戰略退却

戰畧退却，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進攻面前、因為顧及到不能立即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採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畧步驟。可是軍事冒險主義，則堅決反對此種步驟，他們的主張是禦敵於國門之外。對於這種主張：過去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而且直到經過長久歲月，證明這種主張是嚴重地危害着蘇維埃戰爭時，才把他打翻。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闢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往往退讓者打倒其勢洶洶者。

水滸傳上的王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冲，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冲看出王教頭破綻，一腳踢翻了王教頭。

春秋時候，魯與齊戰，魯君不待齊軍疲弊就要出戰，被他的軍師曹劌阻止了，採取了「敵疲我打」的方針，打勝了齊軍，成了中國戰史中弱者對强者作戰的有名實證。今將左丘明叙述那個戰役的文章全部抄在下面。

「春，齊師伐我（魯國），公（魯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不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不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勿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勿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信。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古人鳴鼓進軍）。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追擊）。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克之。」

當時的情況是大國進攻小國。文中指出了戰前的政治準備——取信於民，叙述了利於轉入反攻的陣地——長勺，叙述了利於開始反攻的時機——彼竭我盈之時，叙述了追擊開始的時機——轍亂旗靡之時。雖然是一個不大的戰役，卻同時是說的戰略防禦的原則。中國戰史中合此原則因而取勝的實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漢成皋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等等有名的大戰，

不勝枚舉，都是强弱不侔，弱者先讓一步，後發制人，因而戰勝的。

拿破崙舉三十萬大軍進攻俄國，俄國政府聽從了主張『放棄幷燒燬莫斯科京城然後再打』的軍事家的意見，拒絕了『京城怎麼好放棄更怎麼好燒燬』的許多庸俗的軍事家與政治家的意見，陷拿破崙於飢疲困苦、後路被擾亂、軍隊被包圍的絕境，不得不引退，俄軍乘機反攻，拿破崙僅剩五萬人逃去，成了拿破崙一生中空前的大敗仗，也是世界戰史上有名的大敗仗。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歐戰時，法國開始企圖禦敵於國門之外，集中大軍於德法交界。及見德軍不走此路，又倉卒轉移至法比交界。一戰失敗後，才斷然改變方針，大舉向巴黎退却，盡棄北部工業與農業區。然而這個偉大的戰畧退却是非常正確的，幹這件事是要有非常的決心與毅力才行的。雖然德國以僅僅一星期的時間，以近百萬的大軍，長驅直追巴黎郊外，然而德軍却疲勞了，兵力也減損了，軍心也放肆了，戰線也延長了。法軍則縮短了防綫，增加了兵力，激怒了人心。兩軍强弱的對比，因此起了變化。法國於是集中主力於巴黎西北部，包圍德軍右翼，一戰而勝，把稱雄一世的德軍打退到法國北部，不得不改取守勢，給了整個戰爭以決定的影響。這是最近代的一個最有名的大戰。

就是在歐戰中，而且與上述西戰場的作戰同時，還有一個德軍打勝俄軍的戰役，也是鼎鼎有名的大戰，這卽是東普魯士戰役。當德軍悉力於西戰場時，俄軍以出於德國意料之外的速度，集中了大軍，乘虛攻入東普魯士，長驅直進，柏林震動。興登堡收集不滿十萬的軍隊，連同西戰場調回的一部分在內，在優劣懸殊的力量對比之下，當俄軍的

兩個縱隊分路銳進之時，且進入了困難的地形條件（池沼地帶）之時，集中主力擊破其左路，俘虜九萬餘人，俄軍右路倉惶退却，興登堡以此聲震世界。

上述古代的、中世的、近代的許多例子，證明處於被攻地位以弱敵强的軍隊，在戰爭或戰役的開始階段中，不得不採取戰畧防禦方針，等候有利時機轉入反攻。因爲只有這種方針，才能取得勝利，不然則是必敗之道。

我們的戰爭是從一九二七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暴動廣州暴動是失敗了，秋收暴動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部隊，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井岡山。第二年五月，南昌暴動失敗後保存的部隊，經過湘南游擊戰爭也轉到了井岡山。然而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着樸素性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據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個十六字訣的軍事原則，立三路綫以前的中央是承認了的，而且發布到了全國。後來我們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中央蘇區第一次圍剿時，「誘敵深入」的原則被提出來了，而且應用成功了。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於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這時是軍事原則的新發展階段，內容大大豐富起來，形式也有了許多改變，主要的是從前的樸素性不見了，然而基本的原則，仍然是那個十六字訣。十六字訣包舉了反圍剿的基本原則，包舉了戰畧防禦與戰畧進攻的兩個階段，在防禦時又包舉了戰畧退却與戰畧反攻的兩個階段。後來的東西只是他的發展吧了。

然而從一九三二年一月開始，在黨的『三次圍剿被粉碎後爭取一省幾省首先勝利』那個包含着嚴重原則錯誤的決議案發布之後，就向着正確的原作則鬥爭，最後撤消了這

個正確原則，成立了一整套與此相反的所謂「新原則」，或「正規原則」。從此以後，從前的東西不能叫做正規的了，那是應該否定的「游擊主義」。反「游擊主義」的空氣，統治了整整的三個年頭。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後第三階段變成逃跑主義。直到黨的政治局會議在一九三五年一月舉行於貴州的遵義時，才宣告這個錯誤原則的破產，重新承認過去原則的正確性。這是費了很大的代價得來的。

反游擊主義者說：誘敵深入是不對的，放棄了許多蘇區，過去雖然打過勝仗，然而現在不是不同了嗎？并且不放棄土地又能打勝敵人不更好嗎？在白區或蘇區白區交界去打勝敵人不更好嗎？這裏沒有任何正規性，只是游擊隊使用的辦法，現在蘇維埃國家成立了，我們的紅軍正規化了。我們同蔣介石是國家與國家作戰，大軍與大軍作戰，歷史不應重複，游擊主義的東西是應該全部拋棄的了。新的原則是完全馬克斯主義的，過去的東西是游擊隊在山裏產生的，山裏是沒有馬克斯主義的，新原則與此相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綫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打人」。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禦敵於國門之外」，是「先發制人」，「不打爛罈罈罐罐」，「不喪失寸土」，「六路分兵」，「反對五次圍剿是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的決戰」，是「堡壘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後方主義」，是「絕對集中指揮」，是「短促突擊」，最後，則是大規模「搬家」，並且誰不承認這些新原則，就給他以懲辦主義，加之以機會主義頭銜，如此等等。

無疑的，這全部的理論都是錯了的。這是機械論，這是環境順利時小資產階級革命狂熱與革命急性病的表現，環境困難時，則依照情況的變化以次變爲拚命主義，保守主

義，與逃跑主義，是魯莽家與門外漢的理論與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斯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斯主義的東西。

這裡單說戰略退卻。中央蘇區叫做「誘敵深入」，四川蘇區叫做「收緊陣地」，從前的軍事理論家與實際家也無不承認這是弱軍對於強軍作戰，在戰爭開始階段必須採取的原則。歐美日本的軍事家就這樣說：『戰略守勢之作戰，大都先避不利之決戰，使至有利之情況始求決戰』。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對此也沒有任何的增加。

戰略退卻的目的是為了保存軍力，準備反攻。保存軍力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處在強敵的進攻面前，若不退讓一步，則必危及軍力之保存。過去卻有許多人堅決地反對退卻，認為這是「機會主義的單純防禦路綫」，我們的歷史業已證明這個反對是完全錯誤的了。

準備反攻，須選擇及造成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若干條件，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然後進入反攻階段。

依我們的過去情形說來，大概須在退卻階段中取得下列條件中至少二種以上，才算有利於我不利於敵，才好使自己轉入反攻。這些條件是：

（一）積極援助紅軍的人民；

（二）作戰有利的陣地；

（三）紅軍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發現敵人的薄弱部份；

（五）使敵人疲勞沮喪；

（六）使敵人發生過失。

人民條件，對於紅軍是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蘇區條件。并且由於這個條件，使第四，第五，第六等條件也容易造成或發現。所以當敵人大舉進攻紅軍時，紅軍總是從白區退却到蘇區來，因為蘇區人民最積極地援助紅軍反對白軍的。蘇區中邊區與中心區，也有區別，對於封鎖消息、偵察、運輸、參戰等事，中心區的人民比較邊區為好。所以「退却終點」之選擇，過去中央蘇區一二三次圍剿時，都選在人民最好或較好的地區。由於蘇區這個特點，使紅軍作戰比一般作戰起了很大的變化，是使後來敵人不得不採取堡壘主義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軍隊能够選擇自己所欲之有利陣地，使進攻軍隊不得不就我範圍，這是內綫作戰的一個優良條件，弱軍要戰勝强軍，是不能不講求這個條件的。但是單有這個條件還不夠，還要求別的條件與之配合，首先是人民條件。再則還要求好打之敵，例如敵人疲勞了，或者發生過失，或者該路前進之軍比較缺乏戰鬥力。這些條件不具備時，雖有優良陣地，也只得置之不顧，繼續退却，以就自己所欲之條件。白區未嘗無優良之陣地，但無優良之人民條件，如果其他條件也還未造成或未發現時，便不得不向蘇區退却。蘇區中邊區與中心區的分別也大體是如此。

除地方部隊與箝制兵力外，一切突擊兵力以全部集中為原則。然而當着我們向戰略上取守勢的敵人進攻時，紅軍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敵人大舉向我進攻，紅軍採取所謂「求心退却」，退却的終點，往往選在蘇區中部。但有時也在前部，有時則在後部，這是依照情況來決定的。這種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紅軍主力完全集中起來。

弱軍對於强軍作戰再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揀弱的打。然而當敵人開始進攻時，往往不知敵之分進各軍，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個偵察的過程。往往需要許多時間，才能達此目的。戰略退却之所以必要，這也是一個理由。

如果進攻之敵數量與强度都超過我軍甚遠，要求强弱的對比發生變化，便只有使之深入蘇區，吃盡蘇區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某旅參謀長所說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圍剿軍西路總司令陳銘樞所說：『國軍處處黑暗，紅軍處處明亮』之時，才能達到目的。這種時候，敵軍雖强，也大大減弱了，兵力疲勞，志氣沮喪，許多弱點暴露出來。紅軍雖弱，却養精蓄銳，以逸待勞。此時雙方對比，往往能得出某種程度的均衡，或者敵軍的絕對優勢改變到相對優勢，我軍的絕對劣勢改變到相對劣勢，甚至有使敵軍劣於我軍，而我軍反優於敵軍的事情。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紅軍是一種極端的退却（紅軍集中於蘇區後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因爲當時的圍剿軍超過紅軍十倍以上。孫子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就是指的使敵疲勞沮喪，以求減殺其優勢。

退却以求有利形勢的最後一個要求條件，是造成及發現敵人的過失。須知任何高明的敵軍指揮員，在相當長時間中，求不發生一點過失，是不可能的，乘敵之隙之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如我們自己有時也弄錯，有時也授敵以可乘之隙，是一樣的。而且我們可以人工造成敵軍之過失，例如孫子所謂『示形』之類（示形於東而擊於西，即所謂聲東擊西）。要這樣做，退却的終點，不能限定於某地區，有時退到該地區還無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一步，待敵發生可乘之「隙」。

退却以求有利條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說，須待這些條件完全具備方能舉行反攻，要同時具備這些條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但依據敵人當前情勢，爭取若干必要條件，是强弱懸殊的內綫作戰軍隊所應該注意的，在這上面發生反對的意見是不正確的。

決定退却終點究在何處，須以整個形勢作出發點。在局部形勢看來有利於我轉入反攻的，據此次決定退却終點，如果不同時也於全體形勢有利時，則是不正確的。因為反攻的開始，必須計算到以後的變化，而我們的反攻總是從局部開始的。有時退却終點應該選在蘇區的前部，例如中央蘇區第二第四次圍剿，陝甘第三次圍剿時。有時須在蘇區的中部，例如中區第一次圍剿時。有時則在蘇區的後部，例如中區第三次圍剿。這些都是將局部形勢聯系到整個形勢來決定的。中區第五次圍剿，我軍全然不講退却，原因在於對局部形勢與整個形勢都不注意，實在是一種魯莽滅裂的幹法。形勢是由於條件造成的。觀察局部形勢與整個形勢的聯系，應從當時敵我雙方所具條件之見於局部者與見於全體者，是否在一定之限度上利於我之開始反攻以為斷。

退却終點，在蘇區可以大體上分為前部中部後部三種。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絕在白區作戰呢？不是的。我們拒絕在白區作戰，僅僅指的對付敵軍大規模圍剿，敵我强弱不平，在保存軍力待機破敵的原則下，主張向蘇區退却，主張誘敵深入，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造成或發現利於反攻的條件。如果情況並不這樣嚴重，或者情況的嚴重性簡直使紅軍連在蘇區也無法開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須要再退以求局勢之變化時，那末，把退却終點擬在白區也是應該承認的，至少是理論上應該承認的，雖然我們過去很少這種經驗。

白區退却終點大體上也可分爲三種，第一是在蘇區前面，第二在蘇區側面，第三在蘇區後面。第一種終點，例如中區第一次圍剿時，如果紅軍沒有內部不統一與地方黨的分裂，卽立三路綫與ＡＢ團兩個困難問題存在，是可以設想在吉安南豐樟樹三點之間集中兵力舉行反攻的。因爲當時從贛撫兩河間前進的敵人軍力，比起紅軍來優勢拃不很大（十萬對四萬），人民條件雖不如蘇區，但陣地條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敵分路前進去各個把他擊破的。第二種終點，例如中區第三次圍剿時，假如當時敵人進攻的規模沒有那樣大，而敵有一路從建、黎、泰進，這一路在其力量上又適合於我們打他時，也可以設想紅軍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區集中，首先打破此敵，不必繞道千里走瑞金到興國。第三種終點，同樣例如上述中區第三次圍剿時，假如敵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們也許被迫着退到會、尋、安地區（那裏是白色區域），引敵更向南進，然後紅軍由南而北向蘇區內部打去，這時北面蘇區內部敵之軍力當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這些說明都是假定，沒有經驗，可以作爲特殊的東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則看待。對於我們，當敵舉行大規模圍剿時，一般的原則是誘敵深入，是退却到蘇區作戰，因爲這是使我們最有把握地打破敵人的進攻的。

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意見，反對戰略退却，理由是退却喪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謂「打爛罎罎罐罐」），對外也產生不良影響。在五次圍剿中，則謂我退一步，敵之堡壘推進一步，蘇區日蹙而無法恢復，如果說誘敵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壘主義的五次圍剿是無用的，對付五次圍剿，只能分兵抵禦與短促突擊。

回答這些意見是容易的，我們的歷史已經回答了。關於喪失土地問題，是只有喪失

才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原則。如果我們的喪失是土地，而其取得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的生意。市場交易，買者如果不喪失金錢，就不能取得貨物，賣者如果不喪失貨物，也不能取得金錢。革命運動的喪失是破壞，而其取得是進步的建設。睡眠與休息的喪失是時間，而其取得是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麽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說沒有精神了，這乃是失本生意。五次圍剿的失本正在這一點，不願意喪失一部份土地，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亞比西尼亞的打硬仗，也得到喪失全國的結果，雖然該國失敗的原因不僅僅這一點。

危害人民的問題同此道理，不在一部份人民家中一時的打爛些罎罎罐罐，就要使全體人民永遠的打爛罎罎罐罐。懼怕一時的不良政治影響，就要以永久的不良影響做代價。如果依照俄國左派共產主義的意見，始終拒絕對德和約時，今天的蘇聯也就沒有了。

這種看起來好像革命的左傾意見，來源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急燥病，同時也是農民小生產者的局部保守性。他們看問題僅從一局部出發，沒有能力通觀全局，不願把今天的利益同明天的利益相聯結，把部份利益與全體利益相聯結，撤倒一局部一時間的東西死也不放。對的，一切依照當時具體情况看來對於當時的全局與全時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決定意義的一局部與一時間，是應該撤倒不放的，不然我們就變成自流主義或放任主義。退却要有終點，就是這個道理。然而這絕不是小生產者的近視病，我們是應該學習布爾什維克的聰明的。我們的眼力不够，應該借助於望遠鏡與顯微鏡，馬克斯主義的方法論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與顯微鏡。

當然，戰略退却是有困難的，退却開始時機的選擇，退却終點的選擇，政治上說服

幹部與人民，都是困難問題，而必須給予解決的。

退却開始時機的問題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不但法軍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開始的退却，是時機抉擇的恰到好處，成爲後來反攻勝利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是一個可佩服的英斷；就是我們中央蘇區第一次圍剿時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種時機，即是說如果再遲時，那我們勝利的程度至少是要受到影響的。退却過早與過遲，當然都有損失。但一般說來，過遲的損失是較之過早爲大的。及時退却，對於到達退却終點以後，整頓隊勢，以逸轉勞地轉入反攻，是給予着極大的影響。中央蘇區的一、二、四次戰爭，都從容不迫地對付了敵人。惟獨第三次戰爭，因爲不料敵人經過第二次戰爭那麽慘敗之後，新的進攻來得那麽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們結束二次圍剿，七月一日蔣介石就開始了三次圍剿），紅軍倉卒地繞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勞。如何選擇這個時機，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從敵我雙方大勢上去判斷，和前面說過的選擇準備階段的開始時機所用的方法是一樣的。

戰畧退却，在沒有經驗時，說服幹部與人民的問題是更加困難的問題。當軍事的領導還沒有達到對戰畧退却這樣的問題可以而且應該集中到最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手裏而爲幹部所承認時，困難問題就發生了。由於幹部沒有經驗，對於戰畧退却的不相信，在第一次還有第四次圍剿的初期，第五次圍剿的整期，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難。第一次圍剿是立三路綫的影響，幹部的意見，在沒有被說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進攻。第四次圍剿是軍事冒險主義的影響，幹部的意見是反對準備。第五次圍剿開頭是繼續冒險主義反對誘敵深入的觀點，後來是變成了保守主義。張國燾主義不相信番人與回人地區不能建立我

們的根據地，直待碰壁以後方才相信，也是具體的實例。經驗對於幹部是必須的，失敗確實是成功之母。但虛心接受自己以前的別人的經驗也屬必須，如果樣樣要待自己經驗，否則固執己見拒不接受，這是十足的「狹隘經驗論」，蘇維埃戰爭吃這種虧是不少的。

由於人民沒有經驗而不相信戰畧退却之必要，莫過於中區第一次圍剿之時，當時吉安興國永豐等縣的地方黨及人民羣衆無不反對紅軍的退却。但在有了這一次經驗之後，在後來的幾次大圍剿時，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了。大家相信，蘇區的損失，人民的吃苦，是暫時的，大家都有了紅軍能够打破圍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與否，密切聯系於幹部，因此主要的與首先的問題，在於說服幹部。

戰畧退却全部的作用，在於轉入反攻，戰畧退却備是戰畧防禦的第一階段。隨之而來，而且是全戰畧的决定關鍵，在於反攻階段之能不能取勝。

四　戰略反攻

戰勝絕對優勢敵人的進攻，依靠於在戰畧退却階段中所造成的、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比較敵人開始進攻時起了變化的形勢，而這種形勢是由各種條件造成的，前面已經說過了。

然而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條件與形勢之存在，還沒有使敵人失敗，這種條件與形勢，帶着若干决定勝負的性質，但還不是基本地决定勝負的東西。基本地决定勝負的東西，在於兩軍的决戰。只有决戰，才能基本地、最後地、解决兩軍之間誰勝誰敗的問題。

這就是戰畧反攻階段的全任務。反攻是一個長過程，是防禦戰的最精彩最活躍的階段，也就是防禦戰的最後階段。所謂積極防禦，主要的就是指的這種帶決戰性的戰畧的反攻。

條件與形勢，不僅僅是戰畧退却階段中造成與形成的，反攻階段中繼續地造成與形成着。這時的條件與形勢，不完全和前一階段中的屬於同一形式與同一性質。

可以是屬於同一形式與同一性質的，例如此時敵軍的更加疲勞與減員，不過是前一階段中的疲勞與減員的繼續。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條件與形勢出現，例如敵軍打了一個或數個敗仗，此時的條件，所謂有利於我不利於敵者，就不僅敵軍疲勞等等，而是增加了敵軍打敗仗這個新的條件了。形勢也起了新的變化，敵軍調動忙亂，舉措失當，兩軍優劣之勢，也就不同於前了。

假使一個至數個敗仗不是屬於敵軍，而是屬於我軍，那末，條件與形勢的有利與否，也變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說，敵之不利減少，我之不利開始發生，以至擴大起來，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於前的東西。

無論何方失敗，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敗者方面之一種新的努力，就是企圖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脫出這種新出現的不利於我有利於敵的條件與形勢，而重新創造出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條件與形勢去壓迫對方。

勝利者方面的努力與此相反，力圖發展自己的勝利，加敵以更大的損害，務增加或發展有利於我的條件與形勢，而務不讓其對方完成其脫出不利與挽回危局的企圖。

所以不論在何方說來，決戰階段的鬥爭，是全戰爭或全戰役中最激烈、最複雜、最變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難、最艱苦的，在指揮上說來，是最不容易的時節。

反攻階段中，問題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開始問題，集中兵力問題，運動戰問題，速決戰問題，消滅戰問題等。

這些問題的原則，不論對於反攻說來，或對於進攻說來，在其基本性質上，是沒有區別的。在基本性質上，這些問題的原則，應用於反攻或進攻，都是相同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反攻就是進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進攻。反攻原則，是在敵人進攻時應用的。進攻原則，是在敵人防禦時應用的。在這個意義上，又都有若干的區別了。

爲此理由，我雖然把作戰的許多問題統統設在戰畧防禦的反攻部門中，而在戰畧進攻部門中只說些另外的問題，我們應用時，卻不可忽畧其相同點，也不可忽畧其差異點。爲避重複，這裏說了的，在戰畧進攻部門就不去說他了。

五　反攻開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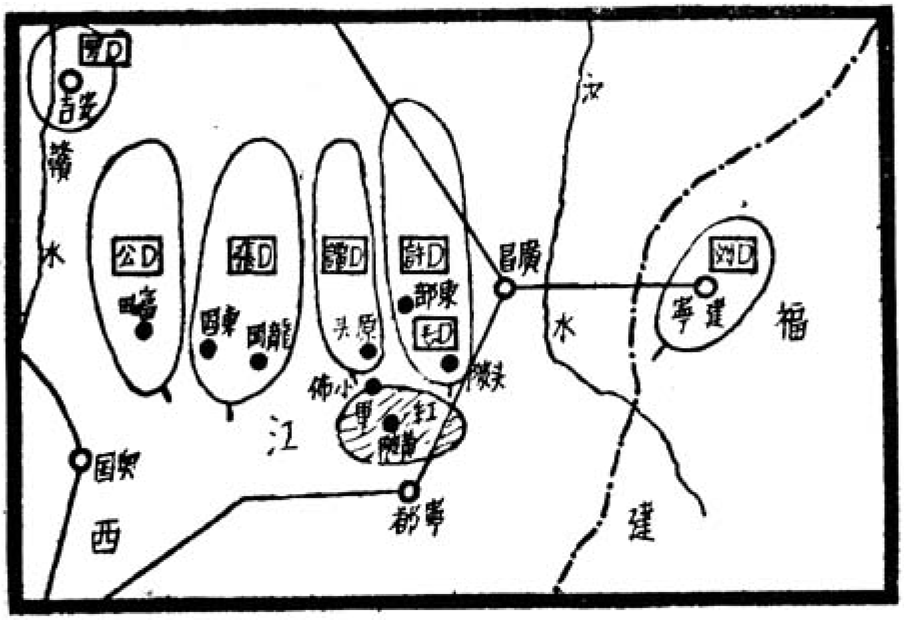
反攻開始問題，即所謂「初戰」或「序戰」問題。許多軍事家都主張慎重初戰，不論在戰畧防禦或戰畧進攻皆然，而以防禦爲尤甚。我們過去，曾經嚴重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區的一次至五次圍剿給了我們以豐富的經驗，研究一下這些經驗不是沒有益處的。

第一次圍剿是敵人以約十萬人之衆，由北向南，從吉安建寧之綫，分八個縱隊向蘇

區遭攻。當時的紅軍約四萬人，集中於黃陂、小佈地區，如第一圖。

當時的情況是：（一）吉安隔在贛江之西，羅師是防衞吉安的。（二）富田、東固一帶人民受AB團欺騙一時不信任紅軍，並與紅軍對立。（三）建寧遠在福建，地屬白區，劉師不一定越入江西。（四）頭陂是白區，東韶有AB團問題，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許再向西打，恐西面張譚公三師集中，不易決勝，不能最後解決問題。（五）張譚兩師是圍剿軍主力，圍剿軍總司令江西主席魯滌平的嫡系，張又是前敵總指揮，消滅此兩師，圍剿就基本上打破了。兩師各約一萬四千人，我一次打一個師是絕對優勢，張師又分置兩處。（六）整個

第一圖：　四萬人集中於黃陂、小佈地區



羅D——羅霖D

公D——公炳藩D

張D——張輝瓚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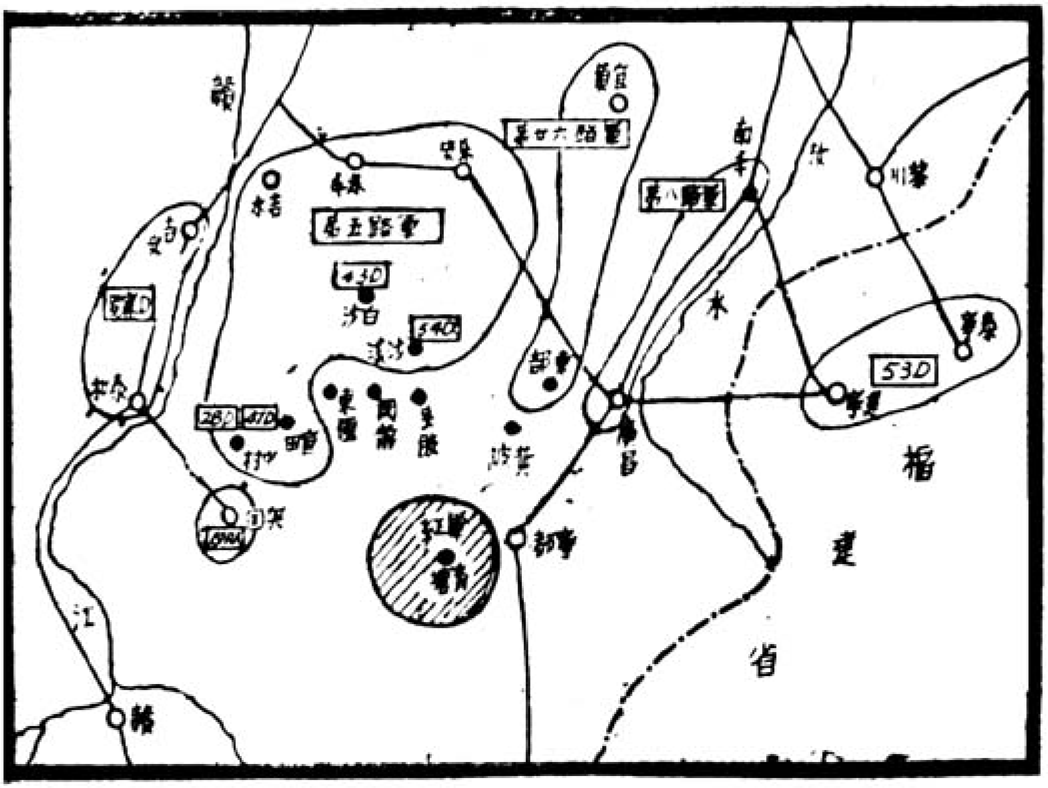
譚D——譚道源D

許D——許克祥D

毛D——毛炳文D

劉D——劉和鼎D

進剿軍不過十萬人，總的形勢不十分嚴重。（七）龍岡源頭一帶人民條件好，又能蔭蔽接近。（八）龍岡有利於我之陣地，源頭不好打，如敵攻小佈就我，則陣地亦好。（九）張輝接近我之集中地。（十）中間突破打一缺口後，敵之東西諸縱隊便被分離爲



第二圖： 第二次圍剿，敵之進攻與我之集中圖

附註

第5路軍（王金鈺）
34D——郭華宗
54D——郝夢齡
28D——公秉藩
47D——王金鈺
第26路軍（孫連仲）
25D——
24D——
第8路軍（朱紹良）
8D——毛炳文
26D——許克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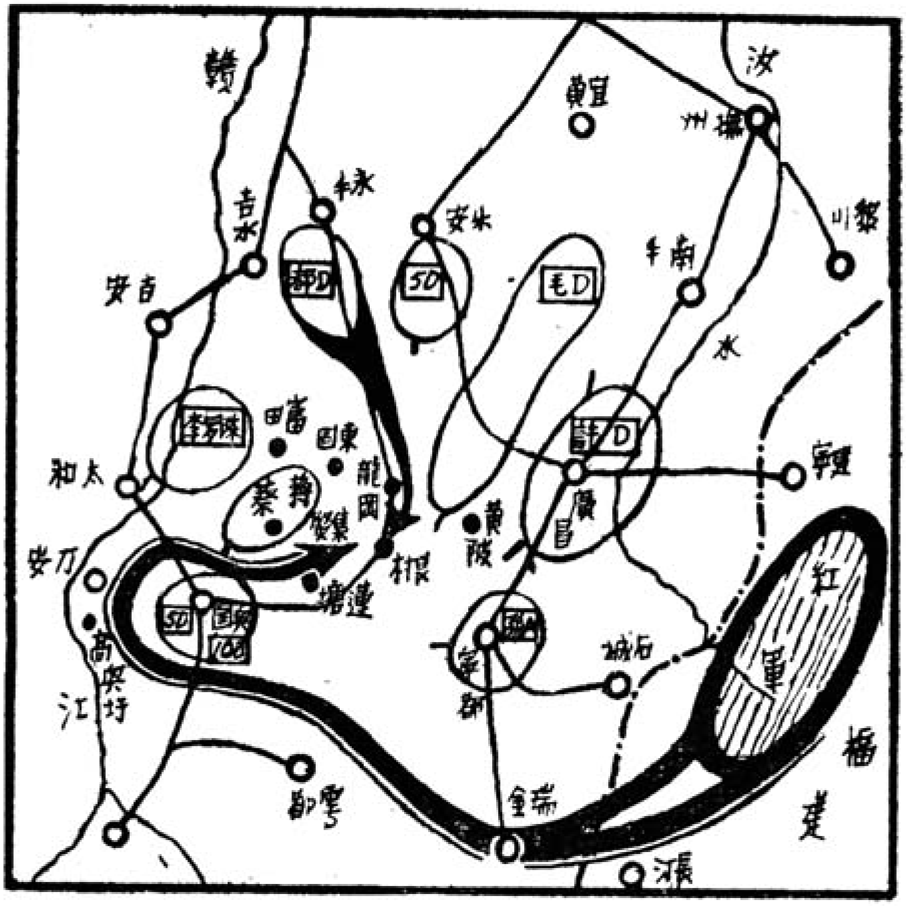
遠距之兩翼。（十一）我在龍岡西南數十里之興國有一個千餘人之獨立師，可迂迴於敵後，能集中最大兵力。基上理由，我們的第一仗就決定了而且打着了張輝瓚主力，連師長在內全部九千人一齊俘獲不漏一人一馬。一戰勝利，譚師向東韶跑，許師向頭陂跑，我軍又追及譚師消滅他一半。五天內打了兩個仗（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廿七日至翌年一月一日），於是富田、東固、頭陂諸敵畏打紛紛撤退，第一次圍剿就結束了。

第二次圍剿，敵之進攻與我之集中如第二圖：當時的情況是：（一）進剿軍二十萬人，何應欽爲總司令駐南昌。（二）同第一次圍剿時一樣，全部是蔣之非嫡系部隊，以十九路軍，孫連仲軍，朱紹良軍爲最强。其餘較弱。（三）AB團肅清，蘇區人民擁護紅軍。（四）王金鈺北方新到，表示恐懼，其左翼郭郝兩路，大體畧同。（五）從富田打起，向東橫掃，可在閩贛交界之建黎泰地區擴大蘇區，徵集資材，便於打破下一次圍剿。若由東向西打去，則限於贛江，戰局結束後無發展餘地。若打完再東轉，又勞師廢時。（六）我軍人數雖畧減（三萬餘），然有四個月的養精蓄銳。基上理由，乃決找王金鈺公秉藩（共十一個團）打第一仗，勝利後打郭，打孫，打朱，打劉，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走七百里，打五個仗，繳槍二萬餘，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圍剿。當打王時，處於蔡郭兩敵之間，距郭十餘里，距蔡四十餘里，人謂我們爲「鑽牛角」，但終究鑽通了，主要因爲蘇區條件，再加敵軍各部之不統一。郭師敗後，郝師星夜逃回永豐，得免於難。

第三次圍剿的敵我形勢，如第三圖。

當時的情況是：（一）蔣介石親身出馬任總司令，下分左右中三個司令。中何應

第三圖： 第三次圍剿良村戰役時的敵我形勢圖



欽，與蔣同駐南昌，右陳銘樞駐吉安，左朱紹良，駐南豐。（二）進剿軍三十萬人。主力軍是蔣嫡系之陳誠、羅卓英、趙觀濤、衛立煌、蔣鼎文五師，師九團，約十萬人。次是蔣光鼐、蔡廷鍇、韓德勤三師，四萬人。次是孫連仲軍，二萬人。餘均非蔣嫡系，較弱。（三）進剿戰略是「長驅直入」，大不同於第二次圍剿之「步步爲營」，企圖壓迫紅軍於贛江而消滅之。（四）第二次圍剿結束至第三次圍剿開始，爲時僅一個月，紅軍苦戰後未休息，也未補充（三萬人左右），又繞道千里回到蘇區西部之興國集中，時敵已分路直廹面前。在上述情況下，我們決定的第一個方針，是由興國經萬安突

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而東，向敵之後方連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蘇區置於無用之地，定此為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為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是避敵主力，打其虛弱。但部隊向富田開進之時，被敵發覺，陳羅兩師趕至，我不得不改變計劃，回到興國西部之高興墟，此時僅剩此一個墟場及其附近地區容我集中了一天，乃決計向蓮塘、良村、黃陂方向進。第一天乘夜通過蔣鼎文師與蔣蔡韓軍間之四十里空隙地，轉到蓮塘。第二天與上官雲相軍（上官指揮本師及郝師）前哨接觸。第三天打上官師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夢齡師為第二仗，爾後以三天行程到黃陂打毛炳文師為第三仗。三戰皆勝，繳槍逾萬。此時所有向西向南之敵軍主力，皆轉旗向東，集中視線於黃陂，猛烈並進，找我求戰，取密集的陣地大包圍姿勢接近了我軍。我乃於蔣蔡韓軍與陳羅軍之間一個二十里間隙的大山中偷越過去，回到西面之興國境內集中。及至敵發覺再向西進時，我已休息了半個月，敵則飢疲沮喪，無能為力，下決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蔣光鼐，蔡廷鍇，蔣鼎文，韓德勳，消滅了蔣鼎文一個旅，韓德勳一個師。蔣光鼐蔡廷鍇兩師，則打成對峙，讓其逃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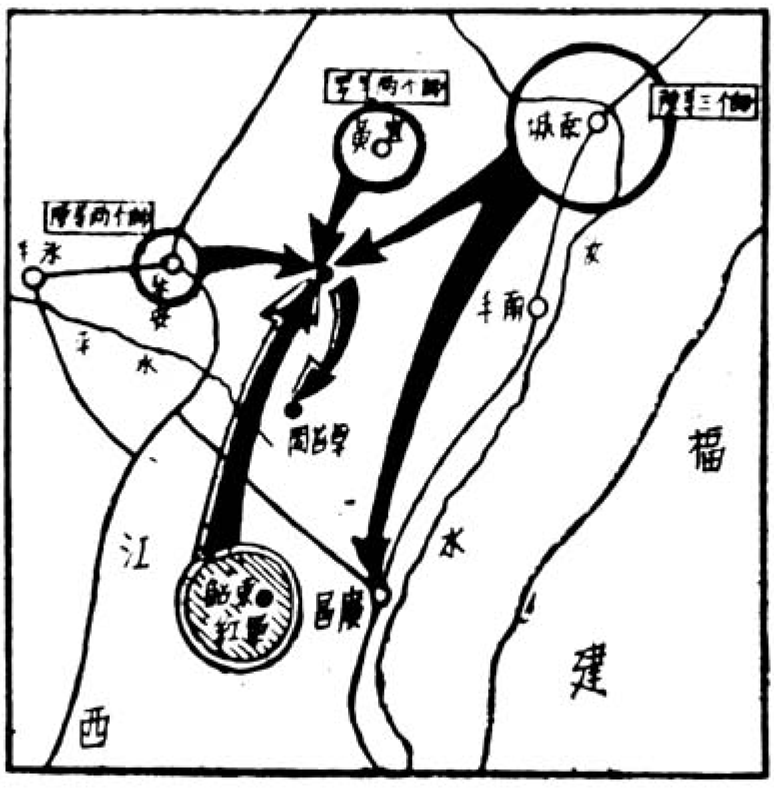
第四次圍剿敵我形勢，如第四圖。

當時情況是：敵分三路向廣昌進，主力在東路，西路兩師暴露於我面前，且逼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於東黃陂以西，一舉消滅李明陳時驥兩個師。敵從左路分出兩個師配合中路再進，我又得消滅其一個師於草苔岡。兩役繳槍萬餘，這個圍剿就基本打破了。

第五次圍剿敵以堡壘主義的新戰畧前進，首先佔領了黎川。我却企圖恢復黎川，禦

敵於蘇區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敵之鞏固陣地兼是白區之硝石，一戰不勝。又打其東北之資溪橋，也是鞏固陣地與白區，又不勝。爾後輾轉尋戰於敵之主力與堡壘之間，完全陷入被動地位，終五次圍剿一年之久，絕無自主活躍之概。最後不得退出蘇區。當時初戰的形勢如第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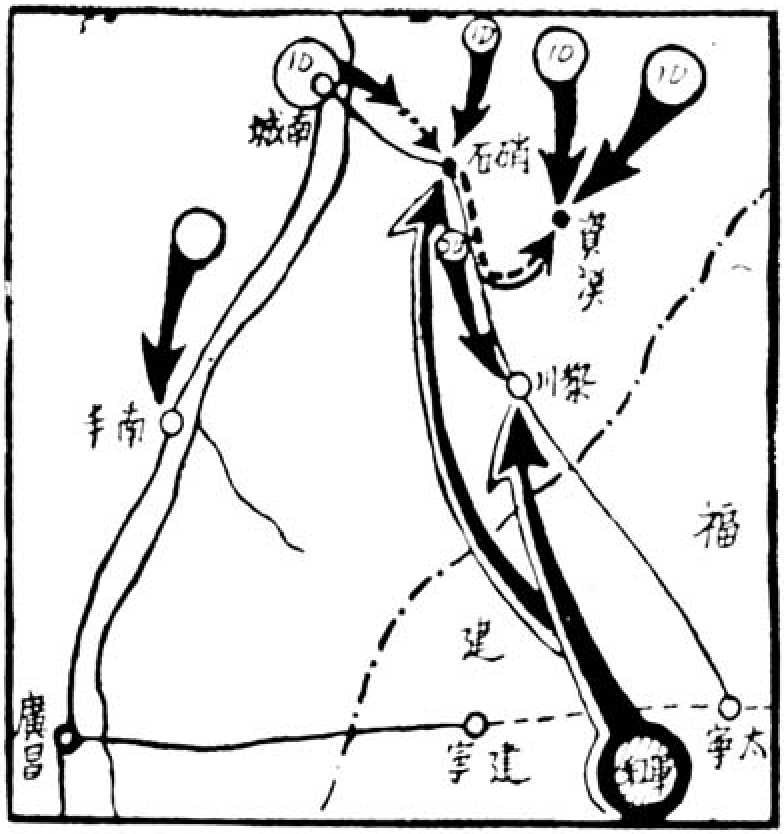
上述一至五次的圍剿經驗，証明處在防禦地位的紅軍，欲打破強大的進剿軍，反攻的第一個戰鬥，關係非常之大。第一個戰鬥的勝敗給予極大的影響於全局，乃至貫澈到最後的一個戰鬥。因此得出下述的結論：



第四圖： 第四次圍剿敵我形勢圖

第一，必須打勝。必須敵情、地形、人民條件，都利於我，不利於敵，確有把握而後動手。否則寧可退讓，持重待機，機會總是有的，不可率爾應戰。第一次圍剿先想打譚道源，僅因敵不脫離源頭那個居高臨下的陣地，我軍兩度開進，卻兩度忍耐撤回，過

第五圖：　第五次圍剿中初期敵我形圖勢



了幾天遇到了好打的張輝瓚。第二次圍剿，我軍開進到東固，僅因等待王金鈺脫離其富田深固陣地，寧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險，拒絕一切性急快打之建議，廹敵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終於達到了要求。第三次圍剿那樣急風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師，又被敵人發覺了我們迂迴其側後的計劃，忍耐折回，改用中間突破，終於在蓮塘打着第一個好仗。第四次圍剿攻南豐不克，毅然採取了退却步驟，終於轉到敵之右翼，集中東韶地區，開始了東黃陂大勝仗。只有五次圍剿全不知初戰關係之大，震驚於黎川一城之得失，從企圖挽救的觀點出發，於洵口不預期遭遇戰勝利之後（消滅敵一師），却不把此戰看作第一戰及其必然引起的變化，而冒然進攻不可必勝的硝石，開脚一步就喪失了主動權，眞

是最蠢最壞的打法。

第二，慎重初戰的再一個理由，在於初戰的計劃必須是全戰役計劃的有機的序幕，沒有好的全戰役計劃，絕不能有眞正好的第一仗。這就是說，卽使初戰打了一個勝仗，若這個仗不但不於全戰役有利，反而有害時，則這個仗雖勝也只算敗了（如五次圍剿的洵口戰役）。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須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後一仗的大體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勝了，敵軍全局將起如何變化，假若敗了，又將如何變化。雖結果不見得乃至決不會盡如所期，然而必須依據雙方全局，仔細地切實地想明白。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眞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還要想到下一戰畧階段的文章。若只顧反攻，不顧反攻勝利後，或萬一反攻失敗後，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盡得戰畧指導者的責任。戰畧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畧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後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階段。儘管往後變化難測，愈遠看愈渺茫，然而大體的計算是可能的，前途的遠景是必要的。那種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導方式，對於政治是不利的，對於戰爭也是不利的。走一步應該看那一步的具體變化，據此以修改或發展自己的戰畧戰役計劃，不這樣做，就會弄出冒險直衝的錯誤。然而貫通全戰畧階段、乃至幾個戰畧階段的、大體上想通了的、一個長時期的方針，是決不可少的，不這樣做，就會弄出遲疑坐困的錯誤，實際上適合了敵人的戰畧要求，陷自己於被動地位。須知敵人的最高指揮，是具有遠大戰畧眼光的。我們只有使自己操練得高人一等，才有戰畧勝利的可能。五次圍剿及張國燾路綫的戰畧指導之所以錯誤，主要的就在於這一點。因此，退却階段時必須計算到反攻階段，反攻階段時必須計算到進攻階

段，進攻階段時又須計算到退却階段。沒有這種計算，束縛於眼前的利害，對於戰爭是十分不利的。

必須打勝，必須照顧全戰役計劃，必須照顧下一戰略階段，這是反攻開始、即打第一仗時、不可忘記的三個原則。

六　集中兵力問題

這個問題看來容易，實行頗難。人人皆知以多勝少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於缺乏戰略頭腦，爲複雜的環境所迷惑，因而被支配於環境，失掉自主能力，採取了應付主義。

無論怎樣複雜、嚴重、慘苦的環境，軍事指導者的頭腦，首先需要的是獨立自主地組織與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敵逼迫到被動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在於迅速恢復主動的地位，如果不能恢復到這種地位，下文就是必然的失敗。

主動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體的物質的，這裏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軍隊。

防禦戰本來容易陷入被動地位，防禦戰大不如進攻戰之能够充分地發揮主動權。然而防禦戰是能够從被動的形式納入主動的內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動階段轉入形式上內容上的主動階段的，完全有計劃的戰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內容上是保存軍力待機破敵，是誘敵深入準備反攻。只有不肯退却，倉卒應戰(例如硝石戰役)，

表面上似在力爭主動，實際上是被動的。戰畧反攻，則不但內容是主動的，形式上也放棄了退却的被動姿勢。對於敵人，反攻是我軍强迫他放棄主動權，同時即投與以被動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達到這種目的，集中兵力，運動戰，速決戰，消滅戰，都是必要的條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與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爲了改變敵我形勢。第一，是爲了改變進退形勢。過去是敵進我退，現在是企圖達到我進敵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戰而勝，這個目的在本戰鬥就達到了，也給與影响於全戰役。

第二，是爲了改變攻守形勢。退却到退却終點，在防禦戰中基本上屬於消極階段，即「守」的階段。反攻則屬於積極階段，即「攻」的階段。雖然在整個戰畧防禦中並沒有脫離防禦性質，然而反攻與退却相較，不但形式上，而且本質上，是起了變化的東西。反攻是戰畧防禦與戰畧進攻之間的過渡的東西，帶着戰畧進攻前夜的性質，集中兵力就爲達此目的。

第三，是爲了改變內外綫形勢。處於戰畧上內綫作戰的軍隊，特別是中國紅軍的被圍剿環境，蒙受着許多的不利。但我們可以而且完全應該，在戰役或戰鬥上，把他改變過來。將敵軍對我軍的一個大圍剿，改爲我軍對敵軍的許多各別的小圍剿。將敵軍對我軍戰畧上的分進合擊，改爲我軍對敵軍戰役或戰鬥上的分進合擊。將敵軍對我軍戰略上的優勢，改爲我軍對敵軍戰役或戰鬥上的優勢。將戰畧上處於强者地位的敵軍，使之在戰役或戰鬥上處於弱者地位。同時，將自己戰畧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變爲戰役上或戰

門上的强者地位。這卽是所謂內綫作戰中的外綫作戰，圍剿中的圍剿，封鎖中的封鎖，防禦中的進攻，劣勢中的優勢，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動中的主動。從戰畧防禦中爭取勝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蘇維埃戰史中，這個問題常常成爲重要的爭論問題。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實行開進與攻擊，幸而敵人（鄧英師）自己逃走了，我們的攻擊本身并沒有奏效。

從一九三二年開始，有所謂「全綫出擊」的口號，要求蘇區東西南北四面出擊，這不但在戰畧防禦時不對，就是戰畧進攻時也是不對的。無論什麼時候，也無論戰畧戰術，都有防禦與進攻，鉗制與突擊的兩方面，事實上絕少所謂「全綫出擊」。全綫出擊的口號，是伴着軍事冒險主義而來的軍事平均主義。在革命前進時，當作一個政治口號是對的，但當作軍事口號就不對了。

軍事平均主義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謂「兩個拳頭打人」的說法，把紅軍主力分割爲二，企圖在兩個戰畧方向同時求勝。那時的結果是一個拳頭置於無用，一個拳頭打得很疲勞，而且沒有當時可能取得的最大勝利。照我的意見，不論一萬兵一百萬兵或一千萬兵，主要的使用方向只應有一個，不應有二個。我不反對作戰方向有二個或二個以上，但主要方向，在同時間內，只應有一個。歐戰時强大的德軍，同時間的主要作戰方向始終只有一個。軍事評論家對於一九一四年八九月間因東普魯士危急抽調西戰場少數兵力東援，還有認爲錯誤的。假如西戰場的不得手，這個抽調是其主要原因或原因之一的話，那末，這個批評是正確的。中國紅軍以弱小的姿態出現於內戰的戰場，其迭挫强敵震

驚世界的戰績，原因在於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無論那一個大勝仗，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是戰畧的說法，是對整個戰爭整個敵我對比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確是如此。不是對戰役與戰術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決不能如此。無論在反攻或進攻，我們總是集結大力打敵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寧都東韶打譚道源戰役，一九三一年八月的興國高興墟打十九路軍戰役，一九三二年七月南雄水口墟打陳濟棠戰役，一九三四年三月黎川團村打陳誠戰役，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虧。如像水口墟與團村這一類的仗，本來一般算作勝仗，而且還算作大勝仗的，（前者擊潰陳濟棠二十個團，後者擊潰陳誠十二個團，）然而我們歷來就不歡迎這種勝仗，在某種意義上說簡直還可以說他們是敗仗。因爲沒有繳獲或繳獲不超過消耗，在我們看來是很少意義的。我們的戰畧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個相反相成的道理，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法則之一。

軍事平均主義，到一九三四年五次圍剿同時，發展到了極點。「六路分兵」，「全綫抵禦」，以爲可以制敵，結果爲敵所制，原因在於懼怕喪失土地。集中主力於一個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箝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損失。然而這是暫時的局部的損失，其代價是突擊方向取得了勝利。突擊方向勝利了，箝制方向的損失就可以恢復了。一二三四次的圍剿都遭受了土地的損失，特別在三次圍剿時蘇區幾於全失，然而結果不但都恢復了，而且擴大了土地。

由於看不見蘇區人民的力量，發生懼怕紅軍遠離蘇區的錯誤心理。這種心理在一九三二年紅軍打漳洲時，一九三三年四次圍剿勝利後紅軍轉向福建進攻時，都曾發生過。

前者懼怕整個蘇區被佔，後者懼怕蘇區一部被佔，而主張分兵把守，結果都證明不對了。在敵人看來，一方面蘇區是畏進，一方面打到白區去的紅軍是他們主要的危險物，所以敵軍的注意力總是向着主力紅軍的所在地，拋開主力紅軍而專向蘇區，是很少這種事情的。在防禦時，紅軍也是主要的吸引力。縮小蘇區的計劃是敵人整個計劃的一部分；但如果紅軍集中主力消滅其一路，敵人就不得不把注意力與軍力更大的向着紅軍。所以敵人縮小蘇區的計劃，也是能够被破壞的。

『堡壘主義的五次圍剿不能集中作戰，只能分兵防禦從事短促突擊』的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三五里一進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壘主義作戰法，不小的成分是紅軍自己的節節抗禦促成的。如果在內綫放棄節節抗禦的戰法，再則必要時轉向敵人的內綫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種。集中兵力的法則，正是戰勝堡壘主義的工具。

立三主義主張廢棄人民武裝與小的游擊戰爭，『一枝槍也集中到紅軍去』，早已證明是不對的了。人民武裝與小的游擊戰爭，在蘇維埃戰爭看來，是和主力紅軍同為一個人的兩隻手，只有主力紅軍而無人民武裝與小的游擊戰爭，僅僅是一個獨臂將軍。蘇區的人民條件，具體說來，特別對於作戰說來，就是武裝起來了的人民。敵人視為畏途，主要的也在這一點。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並不包括放棄人民武裝與小的游擊戰爭在內。

置紅軍的支隊於次要的作戰方向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證對於戰場作戰的絕對或相對優勢的原則上。對於強敵，或關係緊要的戰場作戰，應以絕對優勢兵力臨之，例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集中四萬人打張輝

殲的九千人。對於弱敵或不關緊要的戰場作戰，臨之以相對優勢的兵力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二次圍剿的最後一戰——向建寧打七千人的劉和鼎，紅軍只以一萬多人去打他。

也不是說每次都要優勢兵力，在某種情況下也可以相對劣勢或絕對劣勢兵力出現於戰場。前者例如某一區域僅僅有一枝不大的紅軍，（不是有兵而不集中），當某一優勢敵人進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條件能給我們以大的援助時，以游擊隊或小支隊箝制其正面及一翼，紅軍集中全力突然襲擊其另一翼之一部份，當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勝利的。當我襲擊其一翼之一部份時，兵力的對比仍適用以優勢對劣勢，以多勝少的原則。後者（絕對劣勢）例如游擊隊襲擊白軍大隊伍，僅僅是襲擊其一小部份，同樣適用上述的原則。

集中大軍於一戰場作戰，受限制於地形、道路、給養、居處等的說法，也應該分別的去看。這些限制，對於紅軍與白軍是有程度上的區別的，因爲紅軍較之白軍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難。

我們是以少勝多的——我們向整個中國統治者這樣說。我們又是以多勝少的——我們向戰場上作戰的敵人這樣說。這件事情已經不是秘密，敵人一般都摸熟了我們的脾氣了。然而敵人不能取消我們的勝利，也不能避免他們的損失，因爲何時何地我們這樣打他們，他們不曉得。這一點我們是秘密的，紅軍的作戰一般是奇襲。

七　運動戰

運動戰還是陣地戰？我們的答覆是：運動戰。在沒有優勢兵力，沒有彈藥補充，每一個蘇區中打來打去僅只一個紅軍的條件下，陣地戰對於我們是基本上無用的。陣地戰，對於我們，不但防禦時基本地不能用他，就是進攻時也同樣不能用。

由於敵人强大與紅軍技術貧弱所發生的紅軍作戰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沒有固定的作戰綫。

紅軍的作戰綫，服從於紅軍的作戰方向，作戰方向不固定，影響到作戰綫不固定。大方向雖在一個時期中是不變更的，然而大方向內的小方向則是隨時變更的，一個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轉到另一方向去。一個時期之後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連這種大方向也得變更了。

革命的內戰時期，作戰綫不能固定，就在蘇聯也有過這種情形。他們與我們不同的地方，在於不固定程度不如我們之甚。一切戰爭也不能有絕對固定的作戰綫，勝負進退的變化不許可如此。但相對固定的作戰綫往往見之於一般的戰爭。惟獨敵我强弱懸殊像處在目前階段的中國紅軍這樣的軍隊，則是例外。

作戰綫的不固定，影響到蘇區領土的不固定，時大時小時縮時伸是經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發生。這種蘇區領土的流動性，完全來源於戰爭的流動性。

戰爭與蘇區領土的流動性，影響到蘇維埃建設也發生流動性。若干年月的建設計劃

是不能設想的，計劃改變的頻繁，是我們家常便飯的事情。

承認這種特點，對於我們是有利益的。從這個特點出發，規定我們的日程，不要幻想有進無退的戰爭，不要震驚於蘇區領土與軍事政治後方的暫時流動，不要企圖建立長時期的具體計劃。把我們的思想、工作適應於情況，準備坐下，又準備走路，不要把乾糧袋洒掉了。只有從現在的流動生活中才能爭取將來的比較不流動，才能爭取最後的固定。

統治於五次圍剿時期的所謂「正規戰爭」的戰略方針，否認這種流動性，反對所謂「游擊主義」，當作一個大國家的統治者來辦事，結果是得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里長征。

我們是一個國家，但今天我們還是一個不完全的國家，今天我們還處在內戰的第一時期，距離完全國家還很遠，我們軍隊的數量與技術較之敵人還差得遠，我們的領土還很小，我們的敵人時時刻刻想要消滅我們才快活。從這個上面建設我們的方針，不是一般的反對游擊主義，而是老老實實的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在這裏怕羞是沒有用的，相反，游擊性正是我們的特點，正是我們的長處，正是我們戰勝敵人的工具。我們應該準備拋棄游擊性，但今天還不能拋棄。游擊性在將來一定是可羞的與必須拋棄的東西，但在今天卻是寶貴的與必須堅持的東西。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天下也沒有只承認打不承認走的軍事家，不過不如我們走得這麼利害罷了。對於我們，走路的時間通常多於作戰，平均每月打得一個大仗就算好的。一切的『走』都爲着『打』，我們的一切

戰畧戰役方針都建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然而在我們面前有幾種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敵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敵人雖不多，但與其隣近敵人十分密接，也有時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說來，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鞏固陣地之敵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決戰鬥時，不好再繼續打。以上這些時候，我們都是準備走的。這樣的走是許可的，是必須的。因爲我們承認必須的走，是在首先承認必須的打的條件之下的，紅軍運動戰的基本特點，就在這裡。

基本的是運動戰，并不是拒絕一切陣地戰。戰畧防禦時，箝制方面某些支點的固守，戰畧進攻時孤立無援之敵，那是應該承認用陣地戰去對付的。採取這樣的陣地戰制勝敵人的經驗，我們過去已經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壘、寨子，被我們打開，某種程度的敵人野戰陣地被我們突破。以後還要增加這一方面的努力，補足我們這一方面的弱點。我們完全應該提倡那種在情況需要而且許可下的陣地攻擊與陣地防禦。我們反對的，僅僅是在今天採取一般的陣地戰，或把陣地戰與運動戰平等看待，這些才是不能許可的。

紅軍的游擊性，沒有固定作戰綫，蘇區的流動性，蘇維埃建設的流動性，十年戰爭中一點也沒有變化嗎？是有變化的。從井岡山到一次圍剿爲第一階段，這個階段中游擊性與流動性是很大的，紅軍還在幼年時代，蘇區還是游擊區。從一次圍剿到三次圍剿爲第二階段，這個階段中游擊性與流動性就縮小了許多，方面軍已經建立，蘇區根據地也已經建立。從三次圍剿至五次圍剿爲第三階段，游擊性流動性更縮小了，蘇維埃中央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建立。長征是第四個階段，由於否認小游擊與小流動，就來了一個大游擊與大流動。目前是第五個階段，由於沒有戰勝五次圍剿與大流動的結果，

紅軍與蘇區均相對的縮小了，但又已經在西北建立了根據地，紅軍主力三個方面軍已經統一指揮，爲前此所未有。

依戰略的性質說，也可以說井岡山至第四次圍剿爲一階段，五次圍剿爲又一階段，長征至今爲第三階段。五次圍剿時否認了以前的方針，我們今天又否認了五次圍剿的方針，復活了從前的方針。然而不是否認五次圍剿時的一切，也不是復活從前的一切，復活的是從前優良的東西，否認的是五次圍剿時錯誤的東西。

游擊主義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規性，就是不集中，不統一，缺乏紀律，簡單現象等，這些東西是紅軍幼年時代本身帶來的，有些在當時還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高級階段，必須逐漸地自覺地去掉他，使之更集中些，更統一些，更有紀律些，更複雜化些，就是使之更帶正規性。在作戰指揮上，也應逐漸地自覺地減少那些在高級階段所不必要的游擊性。在這一方面拒絕前進，固執地停頓於舊階段，是不許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於大規模作戰的。

另一方面是運動戰，是現在還需要的戰畧與戰役作戰的游擊性，是無法阻止的蘇區流動性，是蘇維埃建設計劃的靈活變更性，是紅軍建設不要不適時宜的正規化。在這一方面拒絕歷史，反對保留有用東西，貿然地脫離現階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卽的、在當前沒有現實意義的、所謂『新階段』，同樣是不許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於當前作戰的。

我們現在是處在紅軍技術與組織的下一新階段的前夜，我們應該準備轉變到新階段去。不作這種準備是不對的，是不利於將來的戰爭的。在將來，紅軍的技術與組織條件

改變了，紅軍建設提到了新階段，紅軍的作戰方向與作戰綫之比較固定就出現了，陣地戰增加了，戰爭的流動性、蘇維埃領土與建設的流動性、大大減少了。到最後，也就會消滅了。現時所受的限制，如像優勢的敵人，鞏固的陣地等等，就有法子克服了。

我們現在一方面反對五次圍剿時的錯誤的與過早的辦法，另一方面也反對復活五次圍剿以前紅軍幼年時代的一切非正規性。但是我們堅決地恢復紅軍一路來用以打勝仗的許多可寶貴的戰略戰術的原則。同時也吸收五次圍剿鬥爭中關於紅軍建設方面與作戰方面某些優良的與有益的經驗。并且把所有一切過去優良的東西都總結起來，成爲有系統的更發展的更豐富的軍事路綫或戰畧路綫，爭取在今天戰勝我們的敵人，并且準備着轉變到新階段去。

運動戰的實行方面，問題是很多的，如偵察、判斷、決心、戰鬥部署、指揮、隱蔽、迅速、集中、開進、展開、攻擊、追擊、襲擊、陣地攻擊、陣地防禦、遭遇戰、退却、夜戰、特種戰鬥、避强打弱、圍城打援、佯攻、防空、處在幾個敵人之間、超越敵人作戰、連續作戰、無後方作戰、養精蓄銳之必要等等，這些問題在紅軍作戰史中都表現許多的特點，戰役學中將有條理的叙述及之，應給以很好的總結，我在這裏不贅述了。

八　速決戰

戰爭的持久戰，戰役與戰鬥的速決戰，這是一件事的兩方面，這是中國蘇維埃戰爭的兩個同時並重的原則，也可以適用於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

因爲統治勢力的雄厚，革命勢力是逐漸生長的，就規定了戰爭的持久性，在這上面性急是要吃虧的，在這上面提倡「速決」是不正確的。幹了十年的蘇維埃戰爭，對於別的國家也許值得驚奇的，對於我們却好似八股文章還只作了破題、承題、與起講，許多熱鬧文章都還在後面。往後的發展，在一切內外條件的影響下，無疑比較過去有大大增高速度之可能，因爲國際與國內環境已經起了變化，而且會有更大的變化在後面，可以說我們已經脫離了過去的那種慢慢發展孤軍作戰的景況 。然而不應該打算明天就會成功。『滅此朝食』的氣概是好的，『滅此朝食』的具體計劃是不好的。因爲半殖民地中國統治勢力，是許多帝國主義加上國內反革命，國內革命勢力沒有聚集到足以突破內外敵人的主要陣地以前，國際革命勢力沒有直接大量援助中國革命以前，我們的革命同戰爭依然是持久的。從這一點出發，規定我們長期作戰的戰畧方針，是戰畧指導的重要原則之一。

戰役與戰鬥的原則與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決。在這個上面爭取速決，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戰爭問題，古今中外都無不求速決，曠日持久總是認爲不利的。惟獨中國的戰爭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對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戰對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綫時譏笑我們的『打拳戰術』（說的是打過來打過去才能奪取大城市），譏笑我們要待白髮才能看見革命的勝利，這種表現革命急性病的情緒，早已證明是不對了。但這些意見如果放在戰役與戰鬥上面去說，則是非常之對的。原因在於：第一，紅軍的武器尤其彈藥沒有來源；第二，白軍有多個，紅軍只一個，打破一次圍剿要準備迅速的連續戰；第三，白軍各個雖分進，然多是比較的密集，打他一個，如不能迅速解決戰鬥，其餘各個就都

來了。爲了這些理由，不能不採取速決戰。對於我們，幾小時、一天、或兩天解決一個戰鬥是經常的。只有在「圍城打援」的方針下，目的不在打圍敵，而在打援敵，對圍敵是準備着相當地持久的，但對援敵仍然是速決。戰畧防禦時固守箝制方面的據點，戰畧進攻時打孤立無援之敵，消滅蘇區中的白色據點，這些時候也常常給與戰役或戰鬥的持久方針。然而這些持久戰，只有幫助而並不妨碍主力紅軍的速決戰。

速決戰不但是心裡想要如此就成功的（心裡想要當然是首先重要的），還須加上許多具體的條件，主要的是準備充足，不失時機，集中優勢兵力，包圍迂迴戰術，良好陣地，打運動中之敵或駐止中而陣地不鞏固之敵。不解決這些條件，而求戰役或戰鬥速決，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圍剿屬於一個大戰役，依然適用速決原則，而不是持久原則，因爲蘇區的人力財力軍力條件都不許可持久。

但在一般速決原則之下，反對不正當的急燥性是必要的。一個蘇區的最高軍事政治領導機關，估計到蘇區的這些條件，估計到敵方情況，不爲敵之其勢洶洶所嚇倒，不爲尚能忍耐的困難所沮喪，不爲某些挫折而灰心，給予必要的耐心與持久，是完全必要的。中央蘇區打破第一次圍剿，從初戰到結束只有一星期，第二次圍剿只有半個月，第三次圍剿就熬上三個月，第四次是三星期，惟獨第五次熬了整整的一年。第五次剿圍最後突圍還表現了倉卒，依情況還可熬上二三個月用以休息訓練紅軍，假如這樣，又假如突圍後的領導稍爲聰明一點，情況便將有很大的不同。

雖然如此，仍不破壞力爭縮短全戰役時間的原則。除了戰役戰鬥計劃力爭集中兵力

與運動戰等等條件、務期在內綫(在蘇區)消滅敵之有生力量，迅速解決圍剿以外，當圍剿已經證明無法在內綫解決時，應該使用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綫，轉入我之外綫敵之內綫去解決這個問題。堡壘主義發達的今日，這種手段將要成爲經常的作戰手段。五次圍剿進行兩個月之後，當福建事變出來之時，紅軍主力無疑應該轉到以浙江爲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爲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廹使進攻蘇區之敵不得不回援其根本重地，用這種方法粉碎向蘇區的進攻，並用這種方法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而且確定地援助了他。此計不用、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當着打了一年之時，此時雖已不利於出浙江，但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株州長沙與常德，包括湖南的大部份在內，作爲自己的活動地帶，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用此以打破圍剿，保衛蘇區。此計又不用、打破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後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九　殲滅戰

「拚消耗」的主張，對於紅軍是不識時宜的。「比寶」的玩藝兒，不是龍王向龍王，而是乞丐向龍王，未免有點滑稽。對於自己一無所有一切取給敵方的紅軍，基本的方針是殲滅戰。只有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才能解決圍剿與發展蘇區。給敵以殺傷，是作爲給敵以殲滅的手段而採取的，否則便沒有多大意義。因給敵以殺傷而給我以消耗，又因給

敵以殲滅而給我以補充，這是市場交易法則應用於戰爭。擊潰戰對雄厚之敵不是基本上決定勝負的東西，殲滅戰對任何敵人都立即起了決定的影響。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團不如殲滅其一個團。

對一，二，三，四次圍剿，我們的方針都是減殲戰，每次殲滅的敵人對於全敵不過一部份，然而圍剿是打破了。五次圍剿，我們的方針反其道而行之，實際上幫助敵人達到了目的。

高興墟，水口墟一類的戰役是不足爲法的，歷來都認爲是失本生意。我們的經典是必須有所繳獲。

殲滅戰與集中優勢兵力及採取包圍迂迴戰術，同一意義，沒有後者，便不能有前者。人民贊助，良好陣地，好打之敵，出其不意等條件，都是達到殲滅戰不可少的。整團整師之敵被殲滅的事，事實上當然是不常見的，但一有可能，我們的計劃就應向着他。爭取大部殲滅，是我們經常計劃的出發點。

擊潰有意義，乃至讓敵逃去有意義，是對於全戰鬥或全戰役中我軍主力對確定之敵舉行殲滅戰而發生的，否則便沒有什麼意義。這又是一種有所失對有所得而有意義的場合。

蘇區建立軍事工業，須使之不助長依賴性。我們的基本方針應該依賴帝國主義與國內敵人的軍事工業，倫敦與漢陽的兵工廠我們是有權利的，並且經過敵人的運輸隊而送來。這是眞理，不是笑話。某處地方紅軍曾經不知此眞理，那裏的兵工廠（雖然不大）出品最優，那裏的紅軍最少打勝仗。

全世界又將有一場大消耗戰要到來，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已曾大拚其消耗，然而這不足爲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革命暴動與革命戰爭所取法。這樣的暴動與戰爭，主要的是依靠進攻與消滅對手而解決自己的問題。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字版）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战争

第一节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

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

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再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就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它，具体地说，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他们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应该刻板地抄用，因为我们现时战争的情况已经变化了。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

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还不止此。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一个地方和许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这

对于一个指挥员又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没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则在一地一时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第二节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而结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战争，毫无疑义又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战争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

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第三节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

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说到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但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是如此，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和团营动作的关系，连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就是实例。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作战时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规定。在给养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战士吃得太饱，在给养不足的地方却要注意不使战士饿肚。在白色区域，可以因为仅仅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尔后的战斗失败；在红色区域，则走漏消息的问题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战役，高级指挥员有亲自参加之必要，其他则无此必要。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如此等等。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第四节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为什么要组织红军？因为要使用它去战胜敌人。为什么要学习战争规律？因为要使用这些规律于战争。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战争史和我们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

那末，关键在哪里呢?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败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后者是当着指挥员主观地犯了错误，或客观情况起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诉指挥员怎样去处置。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预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

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说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1]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2]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以上是我们的方法。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今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

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岁月中〔3〕，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4〕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5〕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6〕，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7〕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8〕，这个

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时常提到错误方面的意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第三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第一节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的人，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这点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们的敌人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轻视我们，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这是一九三三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结果就是招致了他们的历次的失败。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9〕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10〕产生的过程。

然而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1〕。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第二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2〕）。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3〕，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现在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一看：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

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

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中国红军是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的面前。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

中国红军是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

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

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成了尖锐的对比。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拚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

第三节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

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14〕，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15〕，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

第四章　“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反“围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

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然而不是没有起落的。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

红军的失败是什么呢？在战略上说，只有反“围剿”根本没有成功，才叫做失败，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因为国内战争的根本的失败，就是整个红军的覆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没有的。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事实，我们把它叫做防御的继续，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继续。这就是说，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没有由防御转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然而等到红军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例如我们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陕西，“围剿”的反复又出现了。所以我们说，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

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16〕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

所谓敌人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的战略失败，就是他们的“围剿”被我们打破，我们的防御变成了进攻，敌人转到防御地位，必须重新组织才有再一次的“围剿”。敌人没有如同我们所谓一万多公里的战略转移的那种情形，这是因为他们是全国性的统治者，他们比我们强大得多的缘故。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过的。若干根据地中被红军围攻的白色据点内的敌人突围而出，退却到白区里去重新组织进攻，这样的事是发生过的。如果内战延长，红军胜利的范围更广大时，这种事

情会多起来。但是他们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在一九三〇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17]，福建的两次“围剿”[18]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19]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20]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21]、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跟否认“围剿”反复的“左”倾机会主义直接联系，而说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的一种意见，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〇六年[22]、中国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一八年的布列斯特条约[23]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

“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那时是我们围剿敌人，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地位。那时，“围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说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结束是可以断言的。

第五章　战略防御

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24〕，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25〕，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战胜敌人的。他们的战争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白党进攻时，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

进行的，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也是在保卫首都的口号下进行军事动员的。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26〕，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我们过去的战争，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围剿”的形式。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键在于打破“围剿”。“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围剿”和它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第二节　反“围剿”的准备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因此，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

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容易发生争论。就是，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

所谓红军的准备退却，就是说不要使红军向着不利于退却的方向，不要进攻得太远了，不要使红军过于疲劳。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

的前夜主力红军的必要的处置。这时红军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

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征集新兵须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顾到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又一方面顾到当时红军的情况和整个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消耗的可能限度。

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对“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要顾及“围剿”时间的可能延长。应当计算，主要的是红军，再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整个反“围剿”斗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

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三节　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27〕。

春秋时候，鲁与齐〔28〕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29〕的叙述：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30〕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

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31〕、新汉昆阳之战〔32〕、袁曹官渡之战〔33〕、吴魏赤壁之战〔34〕、吴蜀彝陵之战〔35〕、秦晋淝水之战〔36〕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37〕、广州起义〔38〕是失败了，秋收起义〔39〕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

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40〕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

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41〕，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

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侧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第一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线和AB团[42]两个困难问题存在，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因为当时从赣抚两河间[43]前进的敌人军力，比起红军来优势并不很大（十万对四万）。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但阵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第二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第三种终点，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们也许被迫着退到会昌、寻乌、安远地区（那里是白色区域），引敌更向南进，然后红军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内部打去，这时北面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当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没有经验，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则看待。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

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44〕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45〕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终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

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当然，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退却终点的选择，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都是困难问题，都必须给予解决。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损失。但是一般地说来，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择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46〕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

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损失，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大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围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说服干部。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第四节　战略反攻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化。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第五节　反攻开始问题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围

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一〇）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AB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47〕。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

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48]。（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49]，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50]。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

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

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

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第六节　集中兵力问题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

（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役。

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

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51〕，

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

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

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第七节　运　动　战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革命的内战时期，作战线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们之甚。一切战争也不能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胜负进退的变化不许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的军队，则是例外。

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

于战争的流动性。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

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

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

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针，是现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无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设计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到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

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我们现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红军幼年时代的许多在现时不需要的非正规性。但是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第八节　速　决　战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52〕，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

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53]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没有打破“围剿”而被迫突围时，还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们所说的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

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第九节　歼　灭　战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

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注　释

*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据著者说，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作出了结论，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移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随即在十二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又写了这部著作，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1〕“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

〔2〕孙武子即孙武，中国春秋时代的著名军事学家，著《孙子》十三篇。本文引语见《孙子·谋攻》。

〔3〕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六年毛泽东著此文时，正是十五年。

〔4〕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一九二七

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5〕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李立三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6〕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

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7〕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8〕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和注〔24〕。

〔9〕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训练反共军事干部的组织，创办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地址在江西省的庐山。该团对围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训练，以便普遍推行构筑碉堡以及其他进攻红军的办法。到一九三四年，训练的对象扩大到各非嫡系部队的军官，借以加强蒋介石对各地方军阀的控制。

〔10〕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参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5〕。

〔11〕参见列宁《共产主义》。在该文中列宁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库恩·贝拉说：“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12〕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召开。这次大会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军中有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大会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这次会议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13〕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11〕。

〔14〕参见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4〕和注〔5〕。

〔15〕土匪主义指无纪律、无组织、无明确的政治目标的抢掠行为。

〔16〕指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转移到陕西北部的长征。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

〔17〕参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7〕。

〔18〕一九二九年七月，驻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以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军部率领第二、第三两纵队出击闽中。九月，出击闽中的红四军主力在中途遇到很大的困难，遂回师闽西，先后歼灭了上杭、武平等地的敌军。同时，第一、第四纵队在中共闽西特委的领导下，和广大群众武装一起，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退守长汀、连城，粤敌退守永定。第一次“围剿”至此被粉碎。一九三〇年一月初，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又以十四个团的兵力分七路“围剿”闽西的红军。为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挺进江西，出击“围剿”军的主力江西敌军的后方。江西敌军仓皇回兵自救，福建敌军因内部冲突也从闽西撤走。这样，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很快也被打破。

〔19〕“偏师”，即不是主力军，只是侧翼的一部分军队。

〔20〕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军队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过两次“围剿”，都被红军打败。一九三一年九月，蒋介石又开始筹划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至同年十一月，集结在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已达十五个师。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敌军的“围剿”行动迟迟未能开始。十一月上旬成立的红四方面军，为破坏敌军的“围剿”计划，主动出击，至一九三二年六月，先后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歼敌约六万人，使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彻底破产。

〔21〕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被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在国民党军队的严重“围剿”面前，没有领导红军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强令红军围攻敌军坚固设防的城市，准备夺取武汉。当敌军大举进攻时，他不是采取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作战方针，而是下令红军仓卒迎击，使红军陷于被动地

位。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外线作战。此后，再未返回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

〔22〕指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由高涨时期转入逐渐低落时期的退却。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三节（《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五、第六两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105页）。

〔23〕布列斯特条约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在俄国西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订立的和约。当时，德帝国主义的军队正侵入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前线的俄国旧军队已经瓦解，新的革命军队还没有组织起来。为了使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避免在德军的打击下夭折，列宁主张暂时退却，接受德帝国主义提出的割地、赔款等条件，立刻签订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调整经济，建立红军，使无产阶级保持了对农民的领导，集聚了力量，得以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击溃白军和英、美、法、日、波等国武装干涉者。

〔24〕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广东海陆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决定举行第三次起义。十一月，占领海丰、陆丰和附近地区，组织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到一九二八年三月，这个地区的红军因优势敌军的围攻以及领导指挥上的“左”倾盲动而遭到失败。

〔25〕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26〕见马克思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致库格曼论巴黎公社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393页）；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

命和反革命》第十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586页）。

〔27〕《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相传为公元十四世纪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所作。林冲、柴进都是书中的英雄人物。洪教头是柴进家里的一个武术教师。关于林冲和洪教头比武的故事，见《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

〔28〕鲁和齐是中国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的两个国家。齐是大国，在今山东省的中部和东北部；鲁国较小，在今山东省的南部。鲁庄公，公元前六九三年至前六六二年鲁国的国君。

〔29〕左丘明，春秋末期鲁国人，相传是春秋时代著名编年史《左传》的作者。本文引的一段文章见《左传·庄公十年》。

〔30〕“肉食者”指做官的。“又何间焉”，是“何必厕身其间”的意思。“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中，牺牲玉帛是祀神的物品，“加”是虚报的意思。鲁庄公说他据实报告祭品，表示他对神守信用。“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忠”是尽力做好本分的事。曹刿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君对狱讼处置得合乎情理，便会得到人民拥护，所以可以作战。“公将鼓之”和“齐人三鼓”的“鼓”，都是说鸣鼓指挥士兵冲锋。“登轼而望之”的“轼”，是车前供给乘者扶手的横木，在车上位置较高，所以登轼可以望远。

〔31〕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部，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二〇三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汜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

〔32〕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二三年，刘秀（后称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公元八年称帝，定国号为新）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悬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余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以精兵三千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

〔33〕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二〇〇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十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

〔34〕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公元二〇八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三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带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

〔35〕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二二二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开始，蜀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

〔36〕公元三八三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卫队三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八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

〔37〕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继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业，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州、汕头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38〕参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8〕。

〔39〕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发动秋收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九月间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地领导的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毛泽东率领这支军队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40〕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5〕。

〔41〕见《孙子·军争》。

〔42〕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〇年五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43〕指江西省中部介于赣江和抚河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区。

〔44〕参见《战国策·魏策》。原文是："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45〕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军进行阵地战，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一九四一年与反法西斯盟军配合，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46〕这里所说的藏人，主要是指西康（现在分属四川和西藏）、甘肃的藏族。这里所说的回人，是指甘肃、青海、新疆的回族。

〔47〕刘，指国民党军刘和鼎师。

〔48〕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其指挥部均驻南昌。下辖：左翼集团军，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右翼集团军，陈铭枢任总司令，驻吉安；预备军，卫立煌任总指挥，驻临川。

〔49〕蒋光鼐原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第二次"围剿"时，由蔡廷锴任代总指挥。第三次"围剿"时，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和韩德勤第五十二师被编为右翼集团军第一军团，蔡廷锴任代总指挥。这里的"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应是"蔡廷锴、戴戟、韩德勤"；下文的"蒋、蔡、韩"应是"蔡、戴、韩"，"蒋光鼐、蔡廷锴"应是"蔡廷锴、戴戟"。

〔50〕第三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打上官云相师、郝梦龄师、毛炳文师，三个胜仗共歼敌一万余人，缴枪六千多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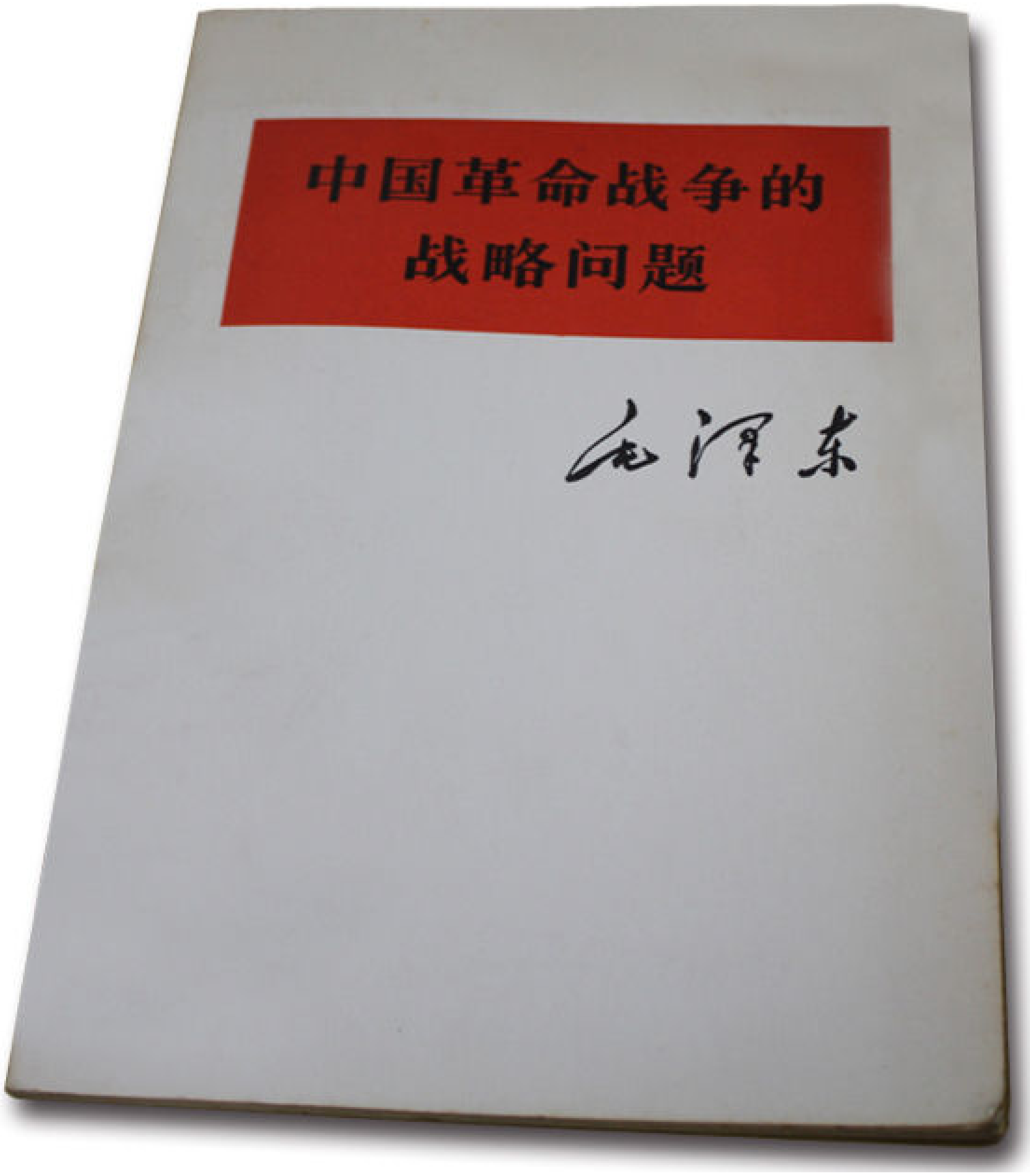
〔51〕南雄、水口战役，包括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圩等战斗，共击溃陈济棠的粤军十五个团。其中水口圩战斗，击溃粤军十个团。

〔52〕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一般

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是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毛泽东这里用写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开过程，来比喻革命发展的各种阶段。但在通常的场合，毛泽东则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和讽刺教条主义。

〔53〕见《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齐、晋两国的军队会战于鞌（今属山东省历城县）。战斗一开始，齐顷公以为胜敌至易，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此”，指这些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先消灭了这些敌人，再吃早饭。结果齐军被晋军打败。后来人们常以此形容斗志坚决，要立即消灭敌人。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同版本封面）



版本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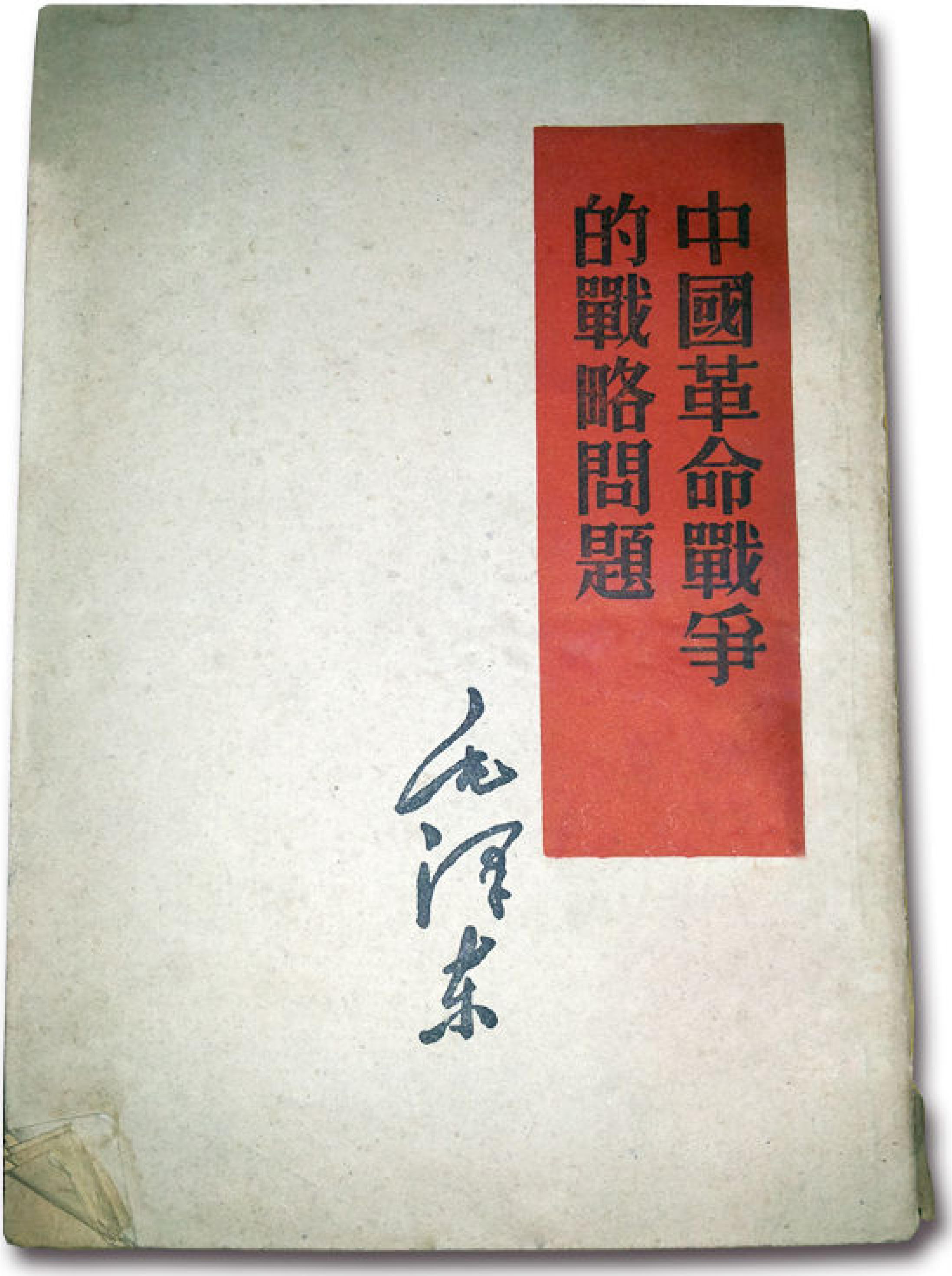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著者： 毛泽东
出版者： 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时间： 1975年12月第1版，197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版本2：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著者： 毛泽东
出版者： 辽东军区政治部翻印
出版时间： 197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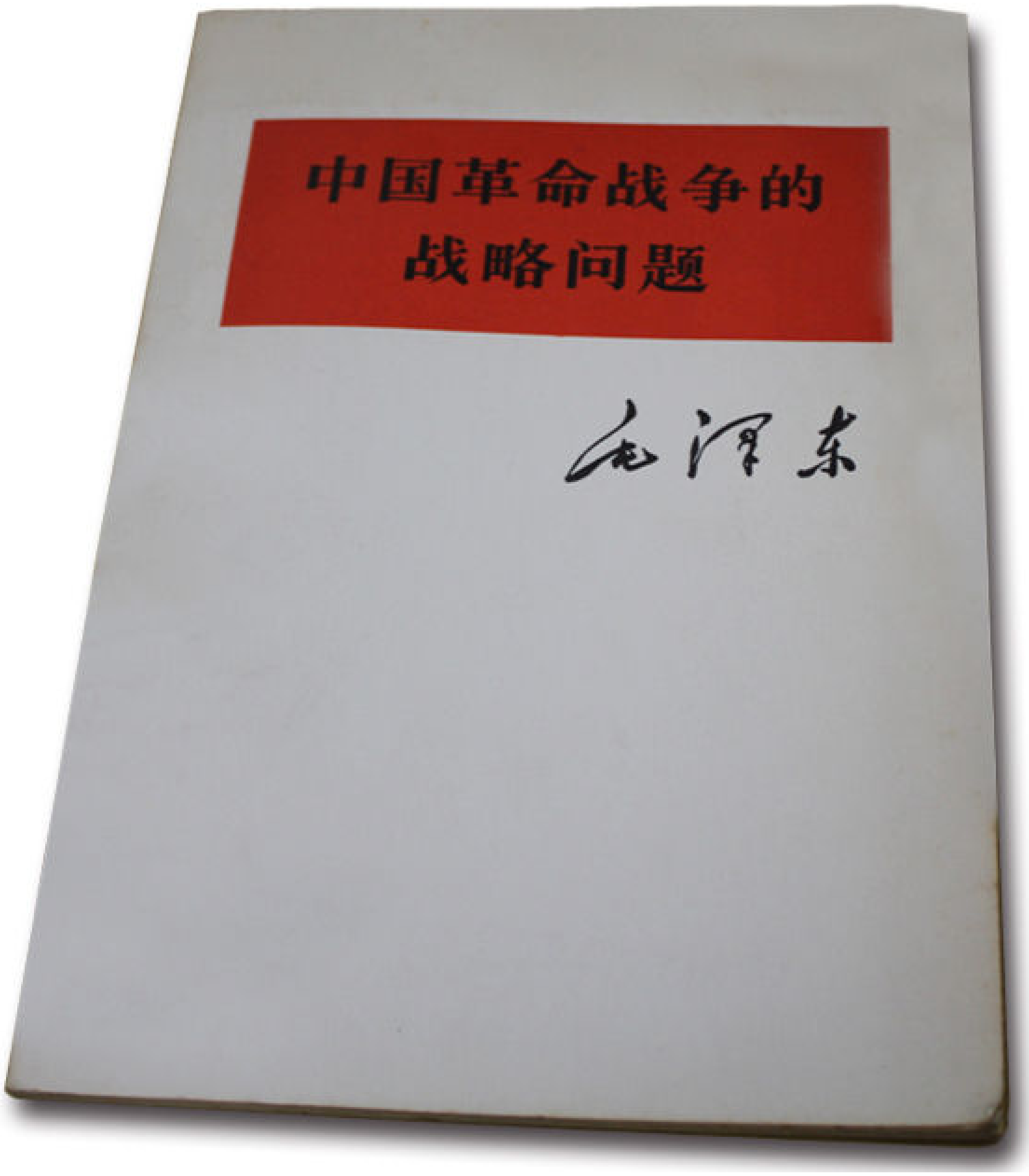
版本3：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著者： 毛泽东

出版者： 人民出版社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

出版时间： 1952年7月第1版，1960年4月长沙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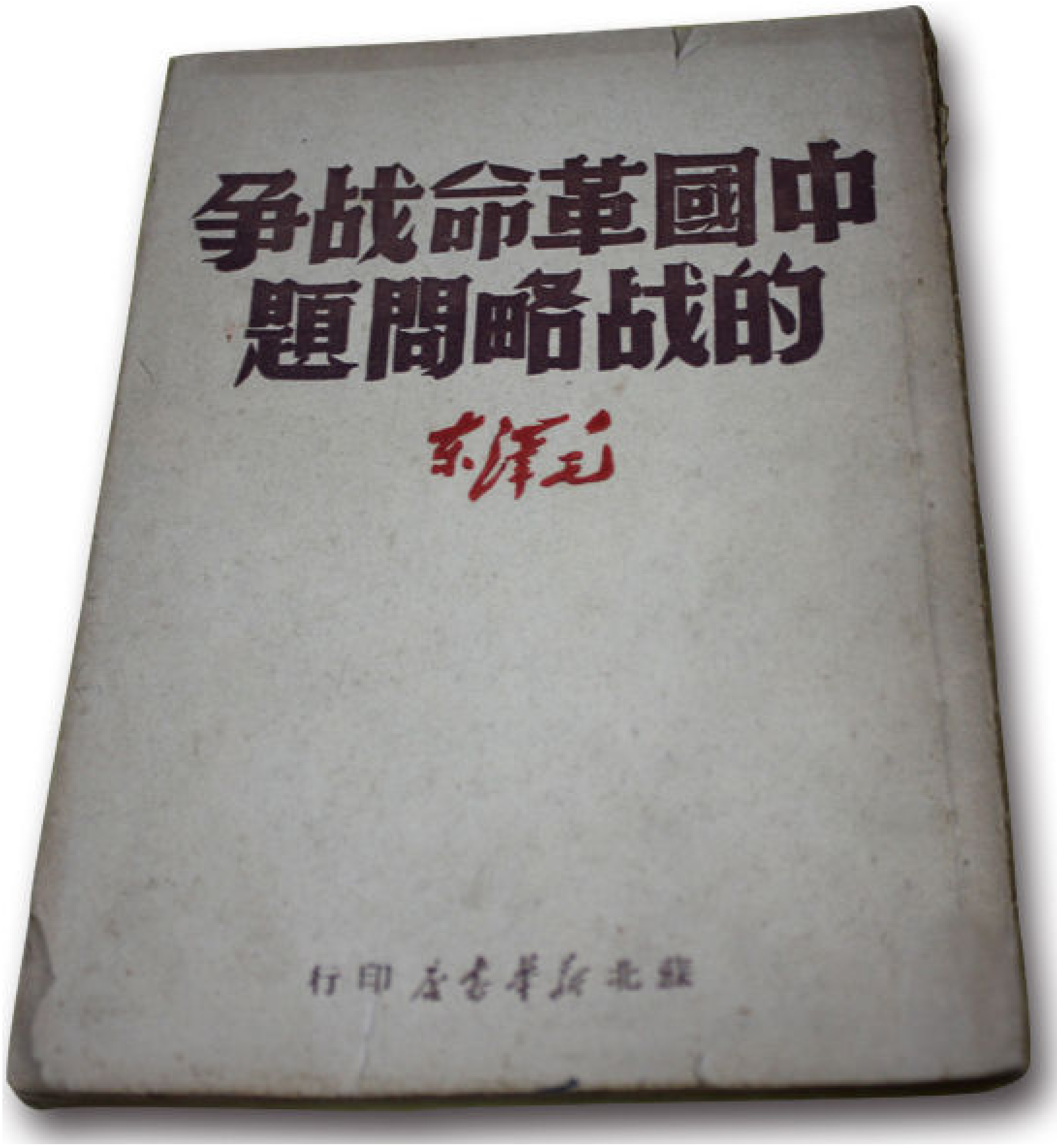
版本4：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著者： 毛泽东

出版者： 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时间： 1975年12月第1版，197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版本5：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著者： 毛泽东

出版者： 苏北新华书店印行

出版时间： 一九四九年七月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背景资料）

该文最初是毛泽东于1936年10月至12月间在陕北红军大学的讲演稿。最早只有油印本。1941年2月出版单行本。后来载于1942年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办的《军事文献》（上）上。后收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党的政策选集》，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编印的《论革命战争》，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等以及解放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等著作中，1991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时，仅对正文作了个别文字的修订。

该文的单行本有100多种版本。其中汉文版建国前有30多种。较早的版本有1936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版本。建国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6种版本。少数民族文版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出版的10多种版本。外文版有50余种版本。盲文版有2种版本。